

索罗斯风暴

季中柱 著

极度秘密

- 赵紫阳担心受牵连中止与索罗斯合作
- 索罗斯愿意接受江泽民李鹏调查
- 索罗斯为什么不再支持中国民运人士
- 朱镕基与索罗斯在香港暗中交手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季中柱 著

内容简介

乔治·索罗斯是应运而起,在世界金融和股票市场上翻云覆雨并赚得了亿万资财的大炒家。

马来西亚总理曾愤怒谴责索罗斯是造成亚洲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索罗斯则希望人们称他为“金融慈善哲学投机家”。

索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当今金融市场的时代弄潮人抑或掠夺世界财富的旷世大奸贼?是关怀人类进步的慷慨慈善家抑或自私自利的卑劣阴谋者?

本书循不同的侧面,描绘和剖析了这位性格和作为都异常复杂的“善恶两面神”,并由此透视亚洲金融风暴这场本世纪末最大的灾难。

目 录

●引子 黑色金融风暴突袭太平洋两岸 (一九九七年)..... (1)

纽约股市大震荡

少数理论家早已提出警告

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东亚

●上篇 时势造英雄 (10)

第一章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一九三〇——一九四七) (12)

“善恶两面神”最初的塑造者

父母是最初的人生教师

黑暗岁月里的动荡生涯

岁月留下深远的阴影

去英国还是去苏联？

匈牙利人的宝贵基因

第二章 “比二次大战中要艰苦百倍” (一九四七——一九五六) (23)

初到伦敦也得在餐馆打工
与未来一生的恩师相逢
波普“开放社会”理论：索罗斯的信念归宿
哲学家培养出一个实践家
第一份工作是推销
亲不亲，家乡人

第三章 新大陆(上):锥处囊中 脱颖而出

(一九五六——一九七三) (32)

做套汇交易的都是短命鬼
“瞎子国里的独眼国王”
商海与书斋两头牵挂
股海里的“新鲜人”

第四章 新大陆(下):量子基金的奇迹

(一九七三——一九八〇) (38)

量子基金一路发
什么是成功之道
索罗斯的个人素质甚为关键
从人和到人不和
常胜将军也走过麦城

第五章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一九八一) (49)

内心深处的交战

人与人：交易关系？

一旦承认成功，就会不再成功？

危机之后是转机

一手捞钱进来 一手捐款出去

第六章 自己掏钱推动“开放社会”

(一九八二——一九八七) (59)

另类基金会：不为赚钱为花钱

“开放社会基金”从点到线再到面

由东到西 全球“开放”

与新的伙伴各有分工

第七章 卷入红色中国政治斗争

(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69)

推开紫禁城沉重的大门

亲自写信给中国强人辨诬

对流亡精英也表失望

第八章 英镑终结者

(一九九〇——一九九二) (74)

欧洲汇率交换体系出现了裂缝

英镑摇摇欲坠

借大钱 冒大险 发大财！

英国人的“黑九月恶梦”

获利全部捐出

第九章 从金融名人转变成公共政策名人

(一九九三——一九九六) (82)

不满足于仅仅以“有钱”闻名于世

从低调转向高曝光率

对赚了大钱大肆张扬

公众形象的转型

国家的财源还是威胁？

第十章 乔治与苏珊 (92)

第一杯苦酒

有钱真不错

把装潢引入艺术世界的中心

●下篇 英雄造时势 (99)

第十一章 掀起惊涛震荡天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月)…………… (101)

“增长王国”之都：泰国曼谷
决定向泰铢下手
下达指令：全面抛售泰铢泰股
惊心动魄的泰铢大搏斗

第十二章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月)…………… (110)

第二次袭击泰铢
祸及东南亚三小虎
围台打港 意在中國
东亚受害国吞下苦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人之危还是急人所难

第十三章 索罗斯自我辩护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九九八年元月)…………… (122)

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索罗斯真能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情有独钟俄罗斯
谁是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
向韩国伸出援手

● 结语 索罗斯版本的“世界大同事” (一九九八)..... (132)

索罗斯的理念是什么？
疗治全球资本体制五大弊病的药方
“全球开放社会”与“亚洲价值观”
人和资本的双重个性

● 附录 (141)

- 一、乔治·索罗斯年表
- 二、亚洲经济复兴是否已成泡影

●引子

黑色金融风暴突袭太平洋两岸

· 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好几千泰国民众，包括几位政府内阁部长，聚集在世界著名的曼谷大佛宝殿前，由一百位和尚带领着向佛陀祈祷。

这些和尚身着随风飘动的桔黄色袈裟，虔诚地请求佛陀，保佑泰国安然度过这场由又贪又狠的“劫魔”索罗斯所造成的金融灾难。

但是几千人跟随和尚悲壮的集体祈祷，并没能阻止那个来自水洋彼岸的“劫魔”索罗斯造成的金融灾难，由泰国向东亚、向北美和世界蔓延。

纽约股市大震荡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本书作者之一（丁中柱博士）坐在美国最大金融集团——大通银行的一间豪华办公室里，与该银行的经济分析师哈里斯先生谈论正发生在纽约的股票市场大震荡。

昨天，星期一，十月二十七日，一天之内美国全国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百分之七，道琼工业指数滑落一百一十六点，成为自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股市价值狂泻的又一“黑暗日”。

连本书的主角，被很多人指责为挑起这次世纪末金融大危机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他的发言人都宣称，索罗斯所拥有的量子基金投资集团本身，也在那个纽约股市的黑色星期里，一下子损失了二十亿美元。

与三十年代股市危机不同的是，这次一九九七年十月的美国股市暴跌，不是受西欧经济萧条的影响，而是直接受到七月份发端于东南亚，继而蔓延至整个东亚的股市和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结果。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关系重点，已从西欧转移了东亚。

“哈里斯先生，我记得你在两个星期前发表的谈话中说过，这次东亚的股市和金融危机将不会影响美国股市，如今你怎样解释这次美国股市的大灾难呢？”丁中柱博士笑着问道。

哈里斯耸了耸肩，轻轻摇了摇头：“以前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持续估计不足。现在看来，整个东亚都受到它的影响。你作为东亚政治经济专家，当然明白持续的东亚股市和金融危机，必然冲击美国股市的运行，因为美国经济与东亚已经建立了很强的互相依赖关系。”

· 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其实，也难怪哈里斯先生的估计错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次几乎都犯了同样的估计错误。连大多数东南亚本地的政治和经济界权威人士，都对此次突发的金融危机感到不可思议，从而陷入惊惶失措，束手无策的困境。

当全世界都在惊羨着东亚的经济起飞奇迹，并郑重其事地谈论着迎接一个亚洲太平洋新世纪的到来时，怎么会想得到这次由东南亚发端的金融危机会如此深刻，如此持久，并进而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呢？

然而，十月份的纽约股市暴跌犹如一当头棒喝，使这些头脑发热的经济学家多少清醒了一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美国主流社会人士开始改变腔调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纽约著名的阿尔伯尼第一股票投资公司首席投资战略分析师胡·强申(Hugh Johnson)就提醒人们，“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就应该郑重其事地研究这次金融灾难所传递的市场信息。”

这是一个什么信息呢？强申认为，“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将不仅仅会伤害东南亚的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那么，谁是这次横行东南亚金融市场，搅起突袭太平洋两岸黑色金融风暴的“黑手党”呢？

一些东南亚受害国的领导人直指国际金融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

少数理论家早已提出警告

其实，也有少数政治经济学者曾经在几年前就对现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潜在危机和东南亚经济体制的脆弱性提出过警告。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契(Lyndon Larouche)在一九九五

年四月三十日发表在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杂志上的一篇名为“全球金融危机：生存，还是死亡”的文章中，曾尖锐地指出，由于全世界都受到所谓“第三次浪潮”理论，即世界发展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移模式的影响，国际金融权力权架基本建筑在货币浮动兑换率机制上，全球货币流通量日益与国民生产值脱节，世界金融体系的动作越来越受到国际级金融大炒手的操纵或影响。因而那些超级大炒手只顾追逐自身利益不计其它后果的后果的金融投机行为，就很可能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的危机，更有甚者，现行世界金融体系最终将会因此而崩溃。拉鲁契把那些国际级的金融大炒手称作横行世界金融市场的“黑手党”。

再如，本书作者之一（丁中柱博士）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发表在 Issues and Studies 杂志第三十期上的题为《论国家角色与计划市场体制》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曾强调，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中过于依赖国际金融市场，没有坚强健全的国内市场作后盾，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大波动的伤害，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的保证。为了筹措发展资金，这些国家向国际资本借贷了大量短期外债用作长期性投资，并在国际市场大量发行可兑换债券，这就使其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单向性依赖”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该经济体的发展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的恩赐，自己本身没有应付危机的调节能力。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起伏，就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中产生震撼性的效果，整个经济体系立即陷于紊乱状况，甚至有崩溃的危险。

可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理论，在所谓主流理论的高分贝大合唱的喧闹声中，是不会被人们注意倾听的。

一直到一九九七年九月份，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一个多月以后，美国的大多数经济专家，与前面提到的哈里斯先生一样，都还

· 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是认为，这次东南亚的问题不会持续太久，因为那个地区的经济正在繁荣上升之际。

而且，“美国的经济不会被亚洲的危机敲倒在地。”普利马克经济决策中心的经济学家阿伦·西奈先生(Allen Sinai)如是说。

“美国的市场已经高涨到月上去了，外力再大又能把它拉下多少呢？”充满自信的摩根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斯蒂文·鲁杰(Stephen Roach)在谈论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时，也没忘记表现一下美国式的幽默。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一九九七年七月发端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但继续深化并迅速扩展到整个东亚，直到笔者行文至此，正如以上提到的少数理论家所预言的，一九九八年一月底，势头未减反烈，其影响强烈地冲击了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东亚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结构性缺失，再加上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非稳定性因素的大“缝”，为少数超级国际金融大炒手，比如乔治·索罗斯之类，利用他们掌握的巨额奖金和高超的投机技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兴波作浪，甚至改变东亚和国际经济发展走向的大“手笔”，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九七年夏季，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使用他惯用的手法，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大笔买空卖空。当他算准某种货币即将贬值之际，就大笔借贷或买进这种货币，然后马上用这种货币去买进另一种较稳定的货币。这样一倒胜，实际上是加速了这种货币的贬值。等到这种货币一贬值，他就一夜之间赚了一大笔。

引子 黑色金融风暴突袭太平洋两岸 · 7 ·

在一九九七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铢是第一个受到索罗斯金融投机危害的货币。七月份，泰国铢开始大幅度贬值。

索罗斯则继续他的投机游戏。从八月到九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轮番倒下，相断大狂跌。

九月份，新加坡和日本的股市与货币也开始被这场金融危机冲击，出现大动荡；南韩货币也自此开始狂跌。

十月下旬，这场金融灾祸跨过太平洋，偷袭美国，引起美国股市大震荡，股票市场价值狂泻。

如此这般，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纪末金融危机，像不可遏止的狂潮，起源于泰国，席卷东亚，波及美国，出乎意料地形成震惊全世界的爆发性金融风暴。

当然，索罗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又赚进了亿万美元。把自己的暴利收入建立在别国人民的痛不欲生，哀鸿遍野上，不管怎么说，总使人想到“不义之财”或“趁火打劫”之类的成语。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这场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二十四日，已经成功地经营了一百年的日本老字号“山一证券株式会社”因受东亚金融危机中有关国家币值狂跌的影响，应变乏术，经营不力，负债二百五十六亿美元，无力偿还，不得不宣布破产，停止营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宣布破产的最大一家日本金融机构。

在此之前，也是十一月，另两家著名的重要日本金融机构，三洋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也因在受到东亚金融危机冲击时经营无方，应变无门，而宣告破产，关门大吉。

跨入一九九八年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未见减弱，反而向广度上扩展。在一九九六年时资产价值达六十七亿美元，曾经在业务上极为繁荣的香港重要金融机构百富勤证券公司，也于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宣告破产清盘。

· 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导致这个曾拥有一千七百多员工，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金融公司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该公司借贷给印度尼西亚的恒安出租车公司(Steady Safe Taxi)的一笔巨额短期贷款无法收回，造成百富勤证郑公司资金短缺，逾期无法偿还银行债款。

在金融危机前的一九九七年六月份，印度尼西亚货币的兑换率曾经是一美元换二千四百盾，十一月份剧跌至一美元换三千六百盾。一九九八年新年伊始，印尼兑换率再次狂泻。一月三日一美元换五千印尼盾，到一月十日，仅仅七天内，戏剧般地惨降至一美元换一万一千印尼盾。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恒安出租车公司只好宣布破产。百富勤证卷公司的贷款当然也随之泡汤而被迫破产。

这样，香港的百富勤证卷公司成了又一个此次世纪末金融危机风暴的牺牲品。

第一个在这场金融风暴中遭殃的泰国，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被迫暂时关闭了五十八家有影响的信托证卷公司，以控制由于本国货币剧贬而造成的无力偿还巨额外债的危机。此外，泰铢币值的狂跌也逼迫银行大幅度提升借贷利息，至十二月上旬，居然高达百分之二十七左右，使得资金周转十分困难。这些都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疲软。

同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马来西亚，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宣布了政府的紧急经济措施，以防止已遭受重创的金融和证卷市场全面崩溃。

这些被称为“痛苦的战略性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控制信贷，和降低一九九八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一九九八年的联邦政府开支将降低百分之十八，国内生产总值将由以前预测的百分之七降至百分之五。

由于这些国家大量的负债公司纷纷破产倒闭，导致成千上万

的雇员陷入失业的困境。不但造成市场购买力剧减,经济萧条,还连带造成社会和政治的动乱。这些国家的民众在仅仅几个月以前还在享受着繁荣的经济,现在一下子却突然遭到如此灾难,心中的不平衡和怨气就特别大。

索罗斯于是成了这一地区千万人发泄怨恨的对象。他们认为索罗斯在东南亚市场上贪婪而狠毒的金融投机活动,引发了这场影响人们前途的金融风暴。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好几千泰国民众,包括几位政府内阁部长,聚集在世界著名的曼谷大佛宝殿前,由一百位和尚带领着向佛陀祈祷。

这些和尚身着随风飘动的桔黄色袈裟,虔诚地请求佛陀,保佑泰国安然度过这场由又贪又狠的“劫魔”索罗斯所造成金融灾难。几千人跟随和尚一起祈祷的场面,十分壮观悲肃。

但是,这场悲壮的集体祈祷,并没能阻止那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劫魔”索罗斯造成的金融灾难继续在泰国和东亚蔓延。这一地区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

索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坊间关于索罗斯怎么以大手笔赚钱、大手笔捐款的书刊已有不少,但其实这个原籍匈牙利的犹太人,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还有许多侧面未为人所知。

现在,就请读者跟随我们的笔锋,来追寻他的轨迹,看看他的冒险生涯和抱负。

● 上篇

时势造英雄

中国和西方神话中都有这样一种两面神：从正面看是慈眉善眼，从背面看则是凶神恶煞。

从哲学上看，这不失为对人性一种深刻的形象概括。

而本书的主人公，大概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两面人”。

同一个乔治·索罗斯，在各种捐款金额最多的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或跻身前茅，人们用景仰的目光凝视他；

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他是心狠手辣的“狙击手”，被人憎恶的视作魔鬼。

第一章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一九三〇——一九四七）

索罗斯认为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自我批判能力来自母亲，从人生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一点则来自父亲——然而，或许他最大的教师，是那片国土和那个特定的年代。

“善恶两面神”最初的塑造者

中国和西方神话中都有这样一种两面神：从正面看是慈眉善眼，从背面看则是凶神恶煞。

从哲学上看，这不失为对人性一种深刻的形象概括。

而本书的主人公，大概就是现实生活中这种“两面人”的一个典型。

同一个乔治·索罗斯，在各种捐款金额最多的排行榜上要么名列榜首，要么跻身前茅，像一九九七年美国最慷慨的人排行榜上，他排在第三位，全年捐款五亿六千万美元——这么大一笔资金，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改变了多少人的前途！

在这种场合，他被称为“慈善家”，人们用景仰的目光凝视他。

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他的形象则为心狠手辣的“狙击手”，像一九九七年把东南亚弄得哀鸿遍野的“索罗斯风暴”中，他赚了成万上亿的钱，又使多少人倾家荡产！

为此索罗斯被人视作魔鬼，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咬牙切齿地咒为“打击他国经济的罪犯”“阴谋家”。

这两种绝难调和的形象，奇特地集于一身。

如此令人大爱大恨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影响了美国，进而影响了世界的人，他做人做事的准则，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 1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西方有言说，“一个人是影响了他的人的产品。”那么影响了索罗斯的人是谁呢？

索罗斯自己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父亲和母亲。

具体地看，他认为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自我批判能力来自母亲，从人生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一点则来自父亲。而这二者不断互相影响，使索罗斯成为今天的索罗斯。

父母是最初的人生教师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二日，索罗斯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

他有个大四岁的哥哥，叫保罗，后来比索罗斯早几年移民美国，办了家很成功的工程公司。

索罗斯的父亲提瓦达·索罗斯(Tivadar Soros)是一位律师，他对索罗斯的人生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索罗斯受母亲伊丽莎白的影响也很深，不过母亲与父亲其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父亲是个外向之人，慷慨大方，对他人命运极为关注，他并不轻易向众人袒露自己的感情——也许他不喜欢正视自己的内心深处，所以他便对别人的情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而母亲则自律甚严，与父亲形成鲜明对照。而她又热爱父亲，时常接受他的有悖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时常形成极大的内心冲突。

索罗斯一直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时常居于父母二人之间，并因此而学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判断是非。索罗斯自己说，除了对待母亲的方式，他对父亲的一切无限信服和崇拜。父亲教他如何应付人生，而母亲则教他如何自省。索罗斯在八十年代初个人第一次婚姻发生危机的时候，才更深地体会到了母亲那种自省态度，

对他内心深处所产生的极大影响。

索罗斯的父亲对索罗斯一向十分钟爱和关怀，陪他度过了很多童年的时光，常常在小乔治放学之后带他去游泳，游完了之后，父亲常常又会讲一段过去的有趣经历。在小乔治看来，父亲那些奇丽的人生故事就像一幕幕肥皂剧。他常常听得入迷，“父亲的人生经历也成了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了。”

据索罗斯追述说，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心要出人头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帝国与德国一起向俄、英、法等国开战，他志愿当了一名士兵上了俄国前线，后来战败被俄军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囚禁。在监狱中，他仍雄心不灭，还办了份刊物，不久被推为战俘的代表。

邻近的战俘营不时发生逃跑的事件，当战俘代表的往往受牵连被杀头，以示对其“看管不严”的惩罚。父亲便想，与其为其他人的逃跑而被杀头，不如自己先逃了。于是他挑了三十个精壮人士，其中有木匠、厨子、医生之类，寻机逃出兵营，又自造了木筏，想顺着河漂到大洋上去。

可惜这些人的俄国地理没学好，漂了好几个星期才觉悟到，西伯利亚的河流都是南北走向的，只会通向北冰洋。他们只好又花了几个月功夫，才从荒蛮返因文明世界，又几经生死才终于活着回到家乡。

此时的父亲已不再野心勃勃了。他再也不想出风头，一心要享受人生，保持自己的独立。

那时候，通常人们都把置些房产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只有他对不动产毫不热衷。不过他与索罗斯的母亲结婚以后，母亲的陪嫁，加上他出版一本世界语杂志的赢利，一家人倒也添过一些房产。

· 1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三址年代欧洲战火再起，父亲及时地陆续变卖这些不动产。

等到德国占领了匈牙利之时，他们已卖却了所有房产。

从来的形势证明父亲此举十分英明，因为战争爆发，房产无论如何也保不住，赶在战争乍起时把它们全变成资本，恰逢其时。父亲说：“我用自己的头脑掌握自己的资本”（在拉丁语中，“头脑”和“资本”是同一个字），令小乔治佩服得五体投地。

索罗斯后来对记者说及，父亲当时虽是个律师，可是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卖力工作，除非火烧眉毛地急待钱用。他记得小时候曾受父亲指派，去找顾客借钱，拿到钱他们就去滑雪度假。玩了回来之后几个星期，是父亲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工作，好挣钱还债。他把为挣钱而工作看做是苦差事，能少干就少干。

父亲这一人生态度让索罗斯佩服了一生：“哪里像我这样？不过嘛，我也极力效仿他了，用另一种形式——我从来不是自己财富的奴隶。”

黑暗岁月里的动荡生涯

一九四四年三月，德国占领匈牙利，匈牙利的犹太人堕入苦难的深渊。

弱国无外交。像匈牙利这样夹在几个强权之间的小国，更是苦不堪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加入了德国、意大利轴心国一方，与英法美苏同盟国成为敌对国。一九四三年，匈牙利政府与同盟国秘密谈判，谋求停火和退出战争。

当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时，轴心国的气焰其实已是强弩之末，但欺负匈牙利还是绰绰有余的。德国人逮捕了匈牙利摄政王，匈

牙利的纳粹党组织了亲德政府，对匈牙利境内的数十万犹太人进行了驱逐和屠杀。包括索罗斯一家在内的所有匈牙利犹太人处境凶险。

小索罗斯当时十四岁，他说那个阶段是他父亲最有光彩的一段人生，因为他比别人更明智地采取了行动，在战乱中保住了全家人，以及其他许多朋友的性命。

有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的生死经历，老索罗斯对局势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个可以循规蹈矩的时候。要是一切都按法律条文，人就可能丢了性命。谁都靠不住，只能自求多福。他给身为犹太人的全家设法搞到了假证件，找到地方把全家人都隐藏起来。父亲精心安排给小索罗斯搞到一个假身分证，让他化名，给一个匈牙利政府高官当“教子”。

老索罗斯不仅照顾自己一家，还帮周围的很多人也出了不少得以活命的主意。那时候他比当律师的任何时候都忙，而且乐此不疲。他们家常常是许多人的“咨询站”，索罗斯还记得，有一度他们住在一个通过浴室才能进屋的住处，人们便在浴室排起队，等着向父亲讨教。

到今天，索罗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台对他的采访谈到那一年往事时，却不认为那是一块可怕的经历，相反，他用的形容词是“冒险”。

在他的记忆中当年伪装和藏匿的经历都成了激动人心的时光，甚至被他形容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父亲懂得应付局面，胸有成竹，还能指点别人，纵使当时局势危险万分，全家却深住自己可以幸免，小乔治觉得自己必会避开所有的危险——生活中既有冒险的刺激，又无真正危险的担忧，在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底下，危险和动荡只不过是平静人生的调味品。这一切给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 1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在许多犹太人命丧集中营的时代，索罗斯的这种“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记忆，未免曾令人寒心。但这并不奇怪，这确是一个少年最真实的感受——令人想起中国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置一个四十岁的人于死地的岁月里某一片阳光，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或许缤纷多彩。

索罗斯因此对父亲崇拜有加。他正是从父亲当年明智而周密的计划中，领悟到求生存的艺术。他说：“人向一个超级大师学到了这门艺术，它无疑对我的投资生涯产生了极大影响。”

岁月留下深远的阴影

其实，索罗斯一家当年所经历的并非那么浪漫。

索罗斯的哥哥就说过，当时他们完全明白，如果在大街上被警察或军人截住，假身份被识破，他们起码要被关起来，就是被一枪打死也不足为奇。周围不是有这样的实例：通常在河边，被击毙的人尸首就滚入河中。

这种凶险经历在索罗斯内心留下的烙印，也远比他表面上对人宣称的要复杂。

索罗斯的一生中有过很多内心冲突，最难驾驶的难题，大概莫过于对自己身为犹太裔，又并不喜欢犹太血统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了。

按照索罗斯自己追溯，这种内心矛盾的种子，正是萌发于在布达佩斯逃避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一九四四年。

小索罗斯化名做了一个匈牙利当局显贵的“教子”，而这个官员的工作就是向犹太人发号施令驱逐他们，或没收他们的财产。作为他的“教子”，索罗斯常常目睹“教父”对着自己同胞干下许多残酷无情的事情。

这当然显得不够“英雄”。不过，在德国和匈牙利纳粹份子围捕了三十万犹太人的当年，保住性命的关键就是自控和超然，暴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肯定就没命了。

索罗斯和他的一家就在这种双重身份之间，冯藉自我控制的能力战战兢兢地踩钢丝，谋求幸存。

索罗斯回忆说，母亲曾被警长叫到警察局去盘问，她斩钉截铁地向警官一口咬定：自己千真万确是假证件上的那个人。但她内心中对说这种假话感到极为惶惑，后来对人描述说，她只觉得“另一个自己正从半空中冷眼观看着我的出色表演”。她被放回家之后马上崩溃，“神经已经崩断了”。

而少年索罗斯，对她竟如此暴露自己的软弱而对她恼火万分。

去英国还是去苏联？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苏联红军挺进匈牙利东部，匈牙利临时政府在东部成立，一个月后，一九四五年初，匈牙利临时政府在莫斯科与同盟国签订了停战协议。二月，苏联红军攻入了布达佩斯。四月，匈牙利全部国土上都清除了纳粹势力，临时政府迁都布达佩斯。

从此，匈牙利以及东欧许多国家，被苏联纳入其势力范围，形成了与西方世界相抗衡的共产主义阵营。冷战开始了。

对于许多匈牙利人来讲，德国的战败投降，苏联的占领和控制，不过是悲剧的一幕转到了下一幕。而对于小索罗斯来讲，则意味着生活中富有刺激的一切被乏味和压迫所取代。随着对犹太人肉体消灭威胁的消失，对精神的意识型态禁锢变得越来越紧。

“我感到生活失去了刺激，而且越来越觉得压抑。”索罗斯回忆说。

· 2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父亲看出了儿子的苦闷，问他：“那他何不到外面闯一闯呢？你想去哪里？”

“英国。”因为少年索罗斯经常收听 BBC 广播，对英国公平竞争的理念印象颇深。但他接着又说，“或者，去苏联吧。因为人想看看这个我们必须接受的新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父亲说：“我在苏联呆过，你听我讲就可以了。”那么就英国吧。

几年之后索罗斯才觉悟，他去英国的决定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而是父亲代他做出的，他为父亲这一英明决策而更加热爱父亲了。

父亲有个亲戚当时在英国，可以请他帮索罗斯在那里申请一所学校，索罗斯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不仅写了信给亲戚，而且每个星期都发去一个明信片。这下亲戚无法忽视他的请求，帮他联系申请，索罗斯终于接到了从英国来的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得有一本护照。在当时的匈牙利，护照极难申请，你坐在家里等去吧，永远没下文。

哥哥有一个同学在警察局工作，索罗斯的申请材料通过这个同学被逐级交上去。光等不行，父亲怂恿他：“去找他们管事的，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消息。”

小索罗斯又照办，隔三差五地去打听和恳求，把护照办公室的每个人都搅得头疼不已。那里的头头甚至说：“给谁护照也不给那个老来找事的小鬼头。”不过就这么磨来磨去他还是终于拿到了护照。

不久，时年十七岁的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和指点。除了他求学时得到父亲经济上的资助，父亲对他的影响就此宣告结束。

直到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父亲才双双也来到英国。那时索罗斯已经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六岁小伙子了。

匈牙利人的宝贵基因

在索罗斯迄今六十八个春秋的人生中,在其故国匈牙利只生活了四分之一的岁月。但是,索罗斯对自己的祖国仍然具有十分深厚的情感。

匈牙利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强敌环伺,多种文化交相激荡,使这片国土常常沦入被奴役的地步,又常常爆发反抗的怒火。

上一个世纪早夭的大诗人裴多菲留下了大量向往自由和歌咏爱情的诗作;而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即是对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最早尝试,又是匈牙利人民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最新斗争。虽然在苏军坦克下被投入了血海之中,但是其反抗精神和经验教训,却被十二年之后的布拉格之春所承继。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东欧天翻地复,都可以依稀听见匈牙利事件激起的遥远回声。

出自这样一个国度,索罗斯其实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不难体会的人生体验和处世哲学。

笔者曾经听过一位与索罗斯有过交往的老作家谈过他去匈牙利开会时对那个国家的感受:在东欧剧变之时,尽管经济陷入困境,失业人口激增,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离开校门根本找不着饭碗,但是却正是在那个年代,申请报名读社会学的青年学子却比例暴涨:他们要弄清他们国家出了什么毛病,怎么去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逃往美国的犹太裔成功移民,人数不少。

说来也巧,就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一九九七年底英特尔公司总裁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

· 2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人物”，而他也正是匈牙利犹太裔，有着与索罗斯如出一辙的身世来历——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逃离苏联控制下的祖国来到美国。与索罗斯略有不同的是，格罗夫是比索罗斯晚了十年，即一九五七年从匈牙利逃到邻国奥地利，然后来到美国的。

一九六八年，索罗斯的父亲去世，享年七二五岁。

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他的母亲学会了不靠任何人独立生活，在她六十岁的时候还去上了大学。一九八九年她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

第二章

“比二次大战中要艰苦百倍”

(一九四七——一九五六)

· 2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哲学大师波普关于“开放社会”的原则，从此时在索罗斯头脑中根深蒂固。

索罗斯后来投资的经营理念、慈善捐款的行动，甚至他的整个人生，都可看见波普学说的影子。

初到伦敦也得在餐馆打工

一九四七年，索罗斯费尽周折拿到护照后，并没有直接到英国，而是随父亲先去瑞士出席一个世界语的国际会议。

十七岁的索罗斯其实对世界语毫兴趣，去参加这个会议是为了出境——离开国境还需要有苏联当局的许可，而他却没有这种许可，只有跟着一群开会的人一起才可能出境。没想到在他等护照的时节，会议代表已经集体离境了。万幸小索罗斯赶上了火车，而且在出海关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来检验他是否有出境许可。

总算是来到瑞士。父亲开完会返回匈牙利，他则留在伯尔尼等候去英国的签证。身边只有父亲给的几百瑞士法郎，不知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签证，颇为惶恐了两个星期。幸亏等候的时间不太长，两个星期后拿到了签证，他终于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注了册，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

泰晤士河畔多了一个满口东欧口音的半大小伙子的身影。雾都伦敦像个年高德劭的绅士，但是对于一个来自异乡的穷小子，显得那样高傲和疏远。初到伦敦，索罗斯苦不堪言，不仅贫困，而且孤独。他打过不少零工，在餐馆里当过招待，经常吃别人吃剩的饭菜。

他事后描述这一段经历时说，在伦敦求学的日子比逃避纳粹的早年岁月更要艰难得多。

与未来一生的恩师相逢

幸亏求学本身给了他很大的补偿，使他觉得吃苦是完全值得的。

在伦敦的岁月里，索罗斯碰到了他的导师、著名哲学家卡尔·雷芒德·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 一九〇二——一九九四)，他的“开放社会”理论，影响了索罗斯整个一生。

波普在哲学史上是个大名鼎鼎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索罗斯又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值得多花点笔墨来介绍一番。

波普一九〇二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与索罗斯相似的是，他的家庭也是犹太裔，但后来改宗基督教；另一点与索罗斯相似的是，波普的父亲也是一个律师。

虽然家庭有某种类似之处，但是后来的人生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波普属于那种在理论思维上十分早慧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离开中学开始自学，后来到维也纳大学旁听，一直到一九二二年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正式学生。

一九一九年春天，他在同学的影响下，一度以为自己是共产党人——其时他刚十七岁，索罗斯在这个年龄离开祖国到英国。但其后不久，发生了枪杀示威工人的事件，使他很受震动，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在我十七岁时，我已成为一名反马克思主义者。”

这段时间他又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对他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于

· 2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一九一九年五月由英国天文学家对日蚀的观察得到证实，使波普开始形成自己对于科学理论的新见解。

一九二八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三年他完成他最重要的著作《科学研究的逻辑》，随后他在欧洲讲学游历。一九三七年欧洲战云密布，他应聘到新西兰任教并著述，战争结束后才回到欧洲，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一九四九年任逻辑与科学方法讲座教授，直到一九六九年退休。

波普认识很多当时科学界的一时之选，如物理学家薛定谔、神经生理学家爱克莱斯等人，他也曾同爱因斯坦进行过长时间讨论。

哲学界对波普评价极为分歧，就是将其列为哪种学派，也莫衷一是。主要是波普在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所关注的课题、所持的观点多有变化。

一般认为他理论大体上可以列为逻辑实证主义，但有人说正是波普把逻辑实证主义送进了坟墓。波普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对于知识理论尤其是科学理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证伪”(Falsification)、“世界 III”的学说，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普“开放社会”理论：索罗斯的信念归宿

对于波普的评价，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能介绍他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开放社会”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普在新西兰任教时写了两本互为补充的书，一本是《历史主义的贫困》，另一本就是我们这里要重点介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这本书于一九四五年出版。索罗斯到英国时，正是这本书引起学术界和社会重视的时候。

在这本书的第一卷中，他全面地批判了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把柏拉图看成是后来集权主义的思想鼻祖。在第二卷中，他全面地批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

波普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封闭社会”，在一个“封闭社会”里，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掌握真理的人，没有错误；而在波普提倡的“开放社会”里，人们公认任何人类的知识和认识都是难免有谬误的。

他认为，应该“把柏拉图的问题：谁应该统治？换成新问题：我们如何组织政治机构可以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治者造成过大的损害？”

在整个欧洲经历过法西斯肆虐和随后的中国主义极权威助之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年轻的索罗斯带来的震动是根本性的。“开放社会”的原则，就从这时起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

索罗斯后来投资的理念，甚至他的整个人生，都可看见波普学说的影响子。索罗斯发财后成为一个慈善家，他捐款的完结就是“为支持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自由和开放社会奋斗的人们”。

哲学家培养出一个实践家

影响了索罗斯的是波普的著作和理念，并不是私人交往。

在索罗斯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前两年，波普并不是他固定的教师。

索罗斯两年完成了三年的课程，第三年他只在学校挂名，好凑足三年时间拿到学位，这时他可以选择一个指导教师。他选中了正好这年应聘担任逻辑及科学方法讲座教授的波普。因为他不仅被波普的开放社会学说深深吸引，波普的科学方法论也对他产生很大启发。他于是递交了一些论文给波普。

· 2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波普读过论文，见到了索罗斯之后，对他说：“我看到你的论文时，还以为我终于让一个美国人明白了我对‘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分析，这意味着我的思想能够置身于封闭社会之外的人产生共鸣。”见面他才发现索罗斯来自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而你经过了极权社会，你明白了并不能算数，所以我大失所望。”

不过，波普仍然热情支持索罗斯去探索和实践。从那以后索罗斯与波普就有了经常相见的机会，到波普垂垂老矣，而索罗斯的事业蒸蒸日上，二人交往比过去更频繁了。

在波普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索罗斯已和他十分亲近。不过那时候，波普已不再处在其学术威望之巅峰了。一九九四年六月，九十二岁的波普来到索罗斯所创办的位于布拉格的中欧大学演讲，与索罗斯已是完全情投意合了。

波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还跃跃欲试要到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另一个校园去讲演，可惜他不久就去世了。

第一份工作是推销

一九五二年，索罗斯拿到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文凭。

索罗斯当年离开祖国时，就没有想到回国服务。祖国还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正是他的导师波普所称的“封闭社会”，对他毫无吸引力。然而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人地两不熟，没有“关系”，要找到份工作很不容易，文凭一时也派不上用场。至于说“开放社会”云云，那种理想化理论在现实生计压力面前显得迂阔不堪。

好不容易通过在一家公司的一个同学朋友介绍，才进了那家公司。索罗斯的第一份工作被称为“管理受训员”，但其实公司并没有什么培训计划，所以他就成了推销员。

刚开始，批发商吩咐他去伦敦向烟草商推销产品，但是由于那

些烟草商都有自己固定的批发商,向他们推销几乎绝无机会。而且在伦敦开着车跑去跑来,要找个停车位十分困难,以致索罗斯一时感到走投无路。幸亏他得到了威尔士海滨的边境证,到那里推销才算有了点生意。

索罗斯后来称那段生涯“是我生涯中的低谷”,因为搞推销离他的理念实在相距太远,而且,推销是一项很怵头的工作,除了可以有一辆车之外一无可取。

索罗斯越来越感到这种工作绝不是他数年苦读之后想干的,也不是他父母所期望的。他下了决心,要另谋高就。初生牛犊不怕不畏虎,索罗斯当下便动笔,给伦敦所有商业银行的总经理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求职信。当然英国风气还很保守,并不时与给不认识的人贸然写信,索罗斯则顾不得自己此举有多离谱。

信发出去以后,还真收到了若干复函。有一位经理煞有介事叫索罗斯去面谈,结果却竟是要当面训诫这个毛头小伙子,将自己的大名拼错了!

只有一位总经理把索罗斯叫去进行了认真交谈,他告诉索罗斯,他这条试图进伦敦的路走得不对。

他实话实说:这里获得位置,多靠裙带关系,每个总经理总有些七大姑八大姨,其中总有比别人都聪明能干点的家伙,职位只够这类人轮班的。如果你有幸与这类人同学,或校友,才有可能在他治下的公司里谋得一职。

“可你连祖国都和他并非同一个!”这位经理坦言劝索罗斯别再谋求这条路。

亲不亲,家乡人

有趣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不久索罗斯在辛格——福莱德兰

· 3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德(Singer & Friedlander)公司谋得一职。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匈牙利人,这就印证了那位银行总经理的告诫:正因为他和老板来自同一个祖国,所以他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时间是一九五三年。

索罗斯以每周七英镑的工作,成为一个带薪受训员,这个工资比当时推销员还少一些,而且索罗斯不得不埋头干一些非常枯燥单调的苦活。

那时候没有电脑,连计算器等工具也不多见,很多工作,比如簿记、资料输入、记录外币比价等等都是用手来算来画。索罗斯干这类活总显得不利索,因为这些不是他的强项。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索罗斯到巴黎过周末见他哥哥,由于大雾中断了交通,他星期二才赶回伦敦上班。

来到办公室之后,他发现所有的人看他都像那里从来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不多一会接受他来公司的总经理叫他去谈话,问他“星期一怎么没来”?索罗斯赶快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打听自己在公司的前景。

总经理直率地告诉他,他的表现尚无突出之处。等着别人为他派些活干,是永远也等不来的,因为没有谁脑子里有现成的活儿。周围人之所以不介意他是否留在那里,是因为反正他工资也不高,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而把他放在哪个部门,他都是那里多余的“第五个轮子”。那么公司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任何人带来能挣钱的客户或是带来生意。

索罗斯明白了,当即提出了辞职。他转身走出总经理办公室,与另一位同事一道去吃午饭。

这位同事是来自纽约的罗伯特·梅耶(Robert Mayer),梅耶的父亲在纽约有一个小小的掮客公司。他听索罗斯讲完全经过之后,告诉索罗斯说,自己的父亲正想雇个帮手。梅耶说,本来他早就想告诉索罗斯的,却一直顾虑如果怂恿索罗斯离开公司,是不是

不妥当,而现在既然索罗斯辞了职,便没有顾虑了。

索罗斯于是来到了纽约,来到了华尔街,走上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战场。

第三章

新大陆(上)：锥处囊中 脱颖而出

(一九五六——一九七三)

“瞎眼国里的独眼国王”在股海与书斋之间犹疑——最后世界上少了一个蹩脚哲学讲师，却多了一个金融奇才

做套汇交易的都是短命鬼

一九五六年九月，索罗斯受从事三角套汇交易(arbitrage)的梅耶公司(F.M. Mayer)之雇，习跨大西洋，来到了美国纽约高楼林立的曼哈顿。

索罗斯回忆说，他获得美国入境签证又是一个很滑稽的故事。

一开始他递上申请表，遭到了美国领事馆拒签。领事说，此人年仅二十六岁，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是什么美国缺不了的专家呢？难道美国就没有和他一样的能人了？

梅耶的父亲，那个要雇索罗斯的公司老板，找到写了《黑市交易年鉴》(Black Market Yearbook)一书的作者福兰兹·皮克(Franz Pick)，由他写了一份担保书给领事。皮克以专家的身分证实说，搞三角套汇交易的人非年轻不可，因为“他们的寿命都不长”。这样索罗斯才拿到签证，来到纽约。

不过索罗斯牢牢记住了皮克的话：干三角套汇交易的都是短命鬼，他暗暗打算，要尽早地从这一行业抽身。

自从来到美国，索罗斯先后在几家老字号的证券和投资公司干过。《美国名人录》上这样记载了他的工作历：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F.M. Mayer 公司套汇交易员；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Wertheim 公司证券市场分析员；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Arnhold & S. Bleichroeder 副总裁。

· 3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索罗斯是靠了梅耶公司之聘来到美国，他一到纽约，就到这家公司开始了从事国际套汇的交易——从一个国家买进债券，再卖给另一个国家。

国际套汇当时还是个比较新的领域，索罗斯的法语和德语很熟练，在趋利避害方面极有天赋才能，三下两进入了情况，得以在国际间各种股票、债券的交易中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慢慢有了点名气。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他与安娜莉斯·维茨莎克(Annaliese Witschak)结了婚。

一九六一年，索罗斯归化为美国公民。

“瞎子国里的独眼国王”

随着欧洲的复兴，股票市场也兴旺发达起来，从事欧洲的证券交易在美国各银行中利润颇丰，令众多投资者跃跃欲试。维希姆公司(Wertheim)看中了索罗斯的才能，聘他去当欧洲证券的市场分析员，同时也做交易。

那时候，美国这边对欧洲各公司的了解可谓极为有限。索罗斯说，“我当时所写的备忘录你今天一定会不忍卒读——太不在行了。”倒不是说它太肤浅，而是主观臆测的成分很大。由于所掌握的资讯很少，许多分析都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资料基础上做出。

中国有句俗话说叫“矮子里面拔将军”，而用索罗斯自己的话说，他“是瞎子国里的独眼国王”——比起美国人来，在东欧生活十七年，在英国等了九年，对欧洲的感觉毕竟准确多了，因此，还未过“而立之年”的索罗斯竟成了从事欧洲投资交易的翘楚，许多巨额投资公司都指望看索罗斯提供的信息做投资决定。

索罗斯第一个研究了德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发现他们的股票

价格比其实际价值低多了。当时在美国,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索罗斯向摩根公司提交了他的分析结果,根据他的分析,这些股票会很快获得两倍甚至三倍的利润。摩根公司不等他写完备忘录就令他马上买进。

那时真是欧洲股票生意的黄金岁月,也是索罗斯担任外国证券分析家最得意的时候,他的金融生涯就这么来了第一次飞跃。

没想到过不多久,风水丕变,美国开始对国外投资实施征收利益的均衡税了。肯尼迪总统要求,对外国投资额外收费百分之十五,使得对欧洲投资的赢利大减。

索罗斯一夜之间没了生意,于是他离开了维希姆公司,去了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

商海与书斋两头牵挂

索罗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受业于哲学大师波普,形而上的许多课题常常萦绕于他的脑海。

当金融业务一忙,自然就不能埋头书案。而由于欧洲证券生意惨淡,索罗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年时间内,索性回过头来专注于写作自己的哲学论文《意识的重任》(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

虽然他从来不曾辞职,但这三年,是他在生意上最无建树的三年。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哲学研究毫无进步,论文改去改来,还是无法自圆其说,他才决定,自己似乎未必能在哲学思辨方面搞出什么名堂,还是再回头去干投资生意吧。

那是一九六六年。当时索罗斯对美国证券还不很在行,但是他越来越有兴趣,打算找个方法去学习学习。

他用公司的十万美元开了个帐户,把这笔钱分成十六份,在每

· 3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一种他觉得比较有吸引力的股票上放上一份或两份。他把自己买这些股票的设想写成报告，之后逐月追踪这些股票的表现，做出记录，逐月写成报告来探讨它们的发展。

这种方式十分有效，索罗斯因之得以与投资界广泛接触，在阿头写哲学论文的几年中，他几乎生活在与现实生活隔绝的真空中，现在，他能够在潜在的投资人身上试验他的投资理念了。如果他得到良性回馈，他便可以知道他的主意行之有效；得到负面回馈时，他便会认真检讨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子。通过这个办法，索罗斯获得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

索罗斯认为，定期检验反省自己的观点，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他也是在尝试将波普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指导金融交易的实践。

股海里的“新鲜人”

索罗斯在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时，第一个主攻目标是货运业。他将他当时负责经营管理的钱的四分之一，投放在货运业的股票，运作得十分顺利，这些货运股票表现甚佳，使索罗斯的试验帐户甚为成功。

随后，索罗斯在一九六八年为公司另建了一个数额不大的投资基金，他取名为“首鹰基金”(First Eagle Fund)。

第二年即一九六九年，索罗斯又从一些富有的投资个体户那里集得四百万美元，设立了“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这个基金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地作业。

但是当他经营管理的两个基金都开始成长的时候，潜在的利益冲突便开始浮出表面了。四十三岁的索罗斯仔细想一想，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和关系，也该独立门户打天下了。

一九七三年索罗斯离开了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创办了自己独立的基金公司，公司名称叫“索罗斯基金”(Soros Fund)。他对所有“双鹰基金”的持股人声明，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跟着索罗斯撤出而到他自己的新公司，还是继续留在原来的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

与原来的公司分手的方式十分和平友好，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直到今天，还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经纪人。

十七年前差点拿不到美国签证的匈牙利年轻人，现在要让纽约的金融市场瞠目结舌了。

第四章

新大陆（下）：量子基金的奇迹

（一九七三——一九八〇）

“宏观投资”“三维结构”“互动理论”……这些哲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归纳似乎都无法令人对索罗斯的成功之道感到信服。

最后只好姑且相信他所说的：“我的特别之处就是我没有特别的投资风格。更精确的说，我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以适应不同条件。”

“我不是根据既在规则出牌，而是在游戏规则中寻求改变。”

量子基金一路发

一九七三年，索罗斯离开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带着双鹰基金的部分股东，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资本，自创索罗斯基金公司。

就像一切惊天动地的事业都起源于一个平常无奇的开端一样，当时恐怕只有索罗斯大做特做充满勃勃雄心的美梦，坚信自己分娩的一定是将创造空前奇迹的“龙种”。别人谁能想到这个索罗斯基金公司——八十年代初改名为“量子基金公司”，由此起步，竟创下了一个全球最具进攻性、获利率最高、最成功的基金公司？

几十年来，他的量子的基金公司，一直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投资基金公司中表现记录最佳的公司之一。

索罗斯特有的“直觉”，使他胜多败少，达到今天的地位。他的这种直觉有不少是在他四十年的金融市场上发展出来的。只是，索罗斯在金融市场这个他大获成功的战场上从来就没有完全知足过。他总在考虑自己真正的才能，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中也确实

· 4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透露出：他与金融市场上那群伙伴并不是“同一块料子上裁下来的”。就连办公室，他也选在尽可能远离华尔街的哥伦布街上。

索罗斯基金公司是以一个国外(荷兰)公司的名义注册发起，只对居住在美国之外，肯付高额年费的富有投资人开放，只吸收非美国公民和非永久居民的投资，大概唯一的例外就是身为经理的索罗斯本人了。

于是它的投资获利，在未返回美国的时候，是不必纳税的，这样它的回报益发无人可比(一九八六年美国政府通过新法律，对量子基金这样的公司征税，索罗斯才开始向美国税局纳税)。

一年年滚下来，当年初创时所投的每一万元，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值两千一百多万了；一九九七年初量子基金公司已经至少有一百一十亿美元的资产(根据另一项资料，量子基金九七年六月底资产为一百五十亿美元，到七月底猛升到一百七十亿美元)，索罗斯及家庭拥有其中约三分之一。

别看九十年代套汇交易基金公司遍地都是，在七十年代像索罗斯基金这样的公司可是凤毛麟角。当时华尔街的注意力多在国内外股票市场，索罗斯则是全球撒网的在手笔。

索罗斯在他的公司里总是最大的股东，他对这一基金的控制也就无人质疑挑战，虽然他不一定总在第一线具体操作，但公司的方向永远是他说了算。

公司也设立了一个董事会，索罗斯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无权参加这个董事会，但这是小事一桩。一位多年挂名的董事透露说：“董事们都无实权，他们在那里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所有决定权在乔治。”目前在任的另一位董事也说过同样的话：“按照荷兰法律，董事的实权还不及看门的。”

法规上的限制也很有限，这给索罗斯基金更大的活动空间。作为一个外国基金公司，虽然它在美国运作还是要遵守美国法律，

但实际上它可以超然于所有针对美国投资公司的法规之外，等于在一种几乎不受任何法规控制的环境下运作。

量子基金公司不同于一般共同基金(Mutual Fund)公司，是所谓的避险基金(Hedge Fund)公司，专门为有钱客户进行投资，使用得更多的是期货交易，下注的对象不是具体在某家公司，而是在货币、利率等金融指标上。它的运作需要运用较高风险的投资技巧，比如用贷借来的钱投资，买空卖空等等。

据许多过去的雇员说，在这种环境中，索罗斯专找限制更松的方面比如货币期货之类，大展其拳脚，简直不受任何束缚，只需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就是了。

什么是成功之道

从索罗斯基金到量子基金，为什么能从成立起就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步步成功？这其中除了投资技巧，还有其它因素吗？

索罗斯的回答是，量子基金公司的投资结构与众不同。它放眼于长远趋势——他称此为“宏观投资”。在较长的时段、较大的趋势里，寻找行情好的股票，不拘于某一种长期或甜的投资，等于是多层面运作。索罗斯把这种独特的多层面运作称为以投资资本为基础的立体结构，或所谓“三维结构”(Three-dimensional)。

此外，索罗斯的投资从不限于某一种期货，他既投资于欧钞，也投资于政府债券和证券。

量子基金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吸引投资人的途径。基金公司都以吸引越多越好的钱为能事，但一般别的基金公司的策略是扩大基金规模，靠手中经营管理金额之庞大，使投资人产生信任感，由此招来更多的客户。如果说这可以归纳为“用公司拥有的钱来吸引钱”的话，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则是“用投资人能赚

· 4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到的钱来吸引钱”。

索罗斯表示：“我们在提高回报率、向客人让利的比例上下功夫。”他们着力于让投资人更多地赚钱。索罗斯本人的钱也在公司里投资，他本人就是个大股东，他作为经理所挣的管理报酬也投入投资。经营者和持股者利益一致，索罗斯称为“投资人都是我开的车上的乘客”，双方没有利益的冲突。

当被问及他的投资风格有什么特别之处时，索罗斯说，“我的特别之处就是我没有特别的牌，而是在游戏规则中寻求改变。”

综观量子基金的发展，可以看到它的风格改变了许多次。在头七年内，运用的并不是“宏观结构”；逐渐地，宏观投资才变得占了主导地位。而近几年来，量子基金又开始投资工业资产了。

索罗斯自己对自己成功的解释，是他的“双向反射回馈机制”（reflexivity）——他自己说过：“就像相对论”。这一科学哲学味道极浓的理论帮助他分析市场，并被他人写入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一书。

根据这一理论，主观的知觉影响客观的条件，反过来客观事件又影响主观的知觉。事物“真正”应该怎样，却并无真正客观的标准。其结果是，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而是趋向于波动，错误的知觉又连锁产生其它错误的知觉，使得这一波动十分剧烈。于是，投资在定价超高或偏低的股票上都可能赚大钱。

市场波动理论并不是索罗斯的发明，他的这一套玄而又玄的说辞，一般人听了大概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觉得并没能精确清晰地解释他是怎么样获得成功的。

他还说过一句让人觉得“神龙见首不尾”的话：“我常常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做了正确的事情”，也许这也是他在闪烁其辞吧！

另一种对索罗斯量子基金成功的解释，是认为他布满全世界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由于有这样的关系，索罗斯得以于七十年

代初在美国政府实施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之前,及时地从日本市场抽身。

据摩根司坦利公司的拜伦·韦恩(Byron Wein)说法:“乔治和许多人有着交易关系,人们从他这里得到消息,他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

在投资过程中如何决策,肯定既有信息的因素,又有分析的因素。索罗斯对信息的把握一向为人所称道甚至羡慕。一位同事回忆起七十年代与日本交易那一次:

“我通常都是在家中进行交易的,一般习惯于做到夜里两点。有天半夜十二点,当时在华盛顿的索罗斯来电话了,‘卖掉日本的全部证券。’我说:‘只剩下两个小时了,全卖掉?’‘全卖掉。’两天以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日本贸易实施限制。这个乔汉真是消息太灵通了。”

另外一个经常不断的关于他的争议甚至诉讼是:索罗斯是否从事了对市场的非法操纵以达致自己成功?一九七七年索罗斯就曾被控操纵股中,十七年后,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才裁决,像索罗斯这样的避险基金公司,不具备操纵市场的能力。

索罗斯的个人素质甚为关键

笔者认为,索罗斯的出身和经历,在他生意的成功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索罗斯出生于东欧(匈牙利布达佩斯),求学在西欧(英国伦敦),金融实践在北美(纽约),这一路走过来,不论是对美国之世界的了解和理解,还是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技能,索罗斯无疑都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具优势。发生在东欧或西欧的任何事情,他自然比从没踏过那片大陆、或者只去开会旅游走马观花的人们,更容易

· 4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把握其来龙去脉了，他的决策也因此就会高出常人一筹。

还有语言交流上的得天独厚。欧洲各国面积较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比美国的州与州之间还便当，欧洲人中会说好几种语言的是普遍现象。笔者认识的一位丹麦女士曾说过，从小学起，北欧三国语言就是丹麦学生的必修课，之后逐渐又加上西欧各种语言，等到中学毕业时，基本上人人可通五六种欧洲语言。来到美国，看到这里很多人只会一种语言，她不禁相当震惊：“那怎么够用！”

索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欧洲人，除了母语匈牙利语和英语，还会法语，德语，在与东欧西欧交流方面，他比只会一种语言的那些美国人就直捷得多，也更易于建立他的关系网。

你大概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才能明白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什么比别人成功。

从人和到人不和

索罗斯一九七三年自创索罗斯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合作伙伴——在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里就一起共事的搭档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

他和罗杰斯两人作为老板，除了与持股人一样得到投资回报利润之外，还领到管理报酬——基金公司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这笔钱他两人一直是分享的。

吉姆·罗杰斯曾经是华尔街一家小型公司的市场分析师，后来成为索罗斯在阿恩厚德与布雷克若德公司的合伙人。他不仅在市场分析方面是行家，而且工作异常拼命，一个人可以干几个人的工作，他对索罗斯的投资原则又是一个难得的知音，所以索罗斯与他配合默契，得心应手。

随着公司的成长，两人却渐渐有了龃龉——罗杰斯不想补充

新人手，因为他只喜欢与索罗斯合作，不想让任何外人插进来。索罗斯每次提出要扩大管理班子，以适应越来越大的业务范围，罗杰斯一定坚决摇头：他是绝不肯与他们合作的。

在认为华尔街人士的市场预测常有错误这一点上，索罗斯和罗杰斯看法一致，并无分歧。华尔街的观点比较老套，索罗斯和罗杰斯不仅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行事想法也确实大相径庭。他们都认为，精通华尔街那路套数的人，不会适应量子基金的运作方式。

但二人不同的是，罗杰斯强烈感觉到流行的观点通常都是错的，是那些有华尔街背景的人令他觉得“无可救药”，而索罗斯则认为自己也很有可能失误——这种看法倒不仅是“虚怀若谷”的个人素质，而是可以从其恩师波普的哲学理念上找到渊源。

不过，即使索罗斯愿意从华尔街找什么人来，却并不想与罗杰斯闹得不愉快——毕竟是罗杰斯在做具体工作。

从公司成立以来，罗杰斯一直具体操作，而关于公司的发展方向，所有决定由索罗斯做出。索罗斯拿出一个主意，由罗杰斯去分析调查，这是二人的分工。索罗斯自己也会作些调查，尤其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领域或出了问题的时候。

按一般常理，投资之前应先做好所有调查研究工作，包括分析市场空间，评估竞争对手，预估未来获利和风险等等。但索罗斯却放出惊人之语说，他是“先投资，后调查”。但考察一番其公司运作的程序，不难看出，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作“索罗斯投资，罗杰斯调查”。

这种分工并不意味着索罗斯自己对调查研究有任何忽视。相反，如果他对向哪个行业投资发生兴趣，他就会要求自己在几天之内对那个行业有所了解。

而罗杰斯也并非只管调查不管投资，他也有过很好的投资设

· 4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想,比如当时国际工业完全不被人们重视,罗杰斯却发现了这一行业中有一些赢利的股票。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罗杰斯敏感到未来的岁月将转入数码世界,而当时,高科技股票一点看不出得宠走红的迹象。罗杰斯和索罗斯看准势头,选择了五个最有潜在发展势头的高技术领域,各买了一些股票,果然出奇制胜。那是他二人合作的黄金时期。

基金公司的形势越来越好,可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合作关系却越来越糟,索罗斯将此归咎于“公司发展迅速,但管理班子却毫不扩大”。

那时他尚未形成关于推进其恩师所提倡的“开放社会”的理念,但在他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公司也面临“开放”和“封闭”之间的抉择?

公司还是雇用了一些极为聪明的人,而他们对这行当完全陌生。罗杰斯对来自索罗斯的批评不以为忤,却不能容忍这些人下属批评他或反对他,这就往往弄得公司里气氛很不愉快。索罗斯觉得罗杰斯把自己周围“弄得像个真空地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亲力亲为。

二人亲密无间的合作难免最终画上句号。索罗斯后来对记者说,他当时对罗杰斯提出了一项“三步策略”:

第一步,二人努力建设合作关系,如果不成,第二步就是索罗斯自己干,罗杰斯不参与;如果这还不行,就走第三步,索罗斯退出,让罗杰斯自己去干。

正是为了准备走这一步,索罗斯将公司名称“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虽然他用的借口是纪念量子力学的革命,他也很确承继了其恩师波普推崇物理学突破的教诲,对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很感兴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自己

己的名字从招牌上抹去。

一九八〇年，两人都感到不可能再合作下去，便将公司分开了。不过量子基金在整个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初仍赢利甚丰。两人分手对公司的影响是发生在一九八一年。这一年在索罗斯整个一生中，可谓最倒楣的一年，索罗斯从精神到物质，到处一片狼藉。

我们在下一章还会详细叙述索罗斯的精神危机。

常胜将军也走过麦城

索罗斯并不是百战百胜，从无失手，像后来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

本来每天做生意就是有盈有亏，有赚有赔，不足为奇。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日常输赢，而是重大失误——索罗斯也确实栽过不少次跟斗。

一九八六年，索罗斯曾被期货贸易委员会罚款七点五万美元，因为他持有的期货超过了限期。

更早些时候，一九七九年，索罗斯基金公司在—桩股票操作的案子中，也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抓住把柄。

弗莱彻·琼斯基金公司(Fletcher Jones)指控说，索罗斯在“电脑科学公司”计划股票公开上市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囤积该公司的股份超过五万四千股。在公开上市之前的几天内，他拼命抛售自己手里这些股票，闹得其它持股人也跟着抛售，造成该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出售价格因此被大大压低了。

控方指控索罗斯在这时使用这样人为造成的低价再买进该公司的股票以牟取暴利，为此索赔一百万美元。最后是索罗斯签署了一个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罪的协议书，才了结此案。

· 4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市场也不总是按索罗斯的意愿波动的。一九八一年，量子基金公司在英国长期政府债券市场上曾损失惨重，使这一年成为迄今为止他的量子基金公司唯一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赔了本的一年。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索罗斯那一次着实下了大力，但是没用，“赔得很厉害”。

索罗斯还是一九八七年全球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输家。

尽管他已经预到这场崩溃，他的分析却产生要命的失误：以为最先受到打击的将是日本不是美国。于是他把自己在日本投下资本都转移到美国来。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反倒是美国股市首当其冲先崩盘。顷刻之间，他的八亿美元灰飞烟灭。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他又一次痛失六亿美元，因为他错把宝押在日圆上。

但这时候他已经羽翼丰满：通过一九九二年的英镑大捷，既在资金上又在名声上都经得起这样六亿美元的挫折了。

索罗斯马上通过媒体宣称，自己和所有投资商一样是凡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这样的损失是很难避免的，重要的是尽量少地损失，尽量多地赢利。

发展到今天，量子基金已经成了一个金融巨人。

据一九九七年统计，量子基金集团（有七个避险基金公司，包括量子基金公司）共拥有一百九十亿美元总资产，在一世界范围内，投资于股票、期货、债券、货币等。量子基金公司以荷兰为大本营，以纽约为基地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是它的主要投资顾问。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言人宣布：在市场暴跌中，集团经历了有史以来一天中损失最大的一次赔钱：二十亿美元，其中一半是量子公司损失的。

这一损失倒不一定全是决策失误，而是来自全世界股票市场价格崩盘，也来自美元的贬值。

第五章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一九八一)

有人问索罗斯，他怎么看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金经理”，他马上答道：“问得好，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已有那么伟大了。但另一个问题是，我能这样伟大多久！”

内心深处的交战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虽然也曾经遭到过不只一次失败，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输赢乃赌徒常事，在人们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势如破竹、无往不胜的幸运之神。自从双鹰基金成立以后，历经索罗斯基金、量子基金等等风雨变迁，平均年赢利高达百分之三十三点二。

然而，只有索罗斯自己知道，他曾经一次次面临决战关头——不是在金融领域，而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己的心灵深处。

索罗斯是学过哲学的人，他对形而上的问题，对自己心灵深处的矛盾，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有比别人更为执着的兴趣和更为敏锐的感知。索罗斯对自己内心矛盾也毫不回避和讳言。

索罗斯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种内心矛盾，也有过很多次激烈的内心冲突。最难驾驶的难题，大概莫过于对自己身为犹太人，又不喜欢犹太人的内心挣扎了。这种身分与生俱来，不可改易，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困扰。

根据他自己的追溯，这种内心挣扎起源于一九四四年——在布达佩斯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的那一年。

这一年在索罗斯的记忆中最为清晰。十四岁的犹太裔孩子索罗斯，在表面上却是叫另一个名字、拥有另一个身分证的非犹太裔孩子，父亲的这种精心安排固然使他得到了生命的庇护，却也把他

投入了精神的泥沼。

他不得不以一个匈牙利政府高官的“教子”的身分，常常目睹自己以压迫和虐杀犹太人为业的“教父”，对着自己同胞伤天害理，自己却作声不得。在三十万犹太人被纳粹围捕、任之宰割的岁月里，暴露自己的犹太血统肯定就没命，“生死关头无英雄”，逞强抵抗根本有何意义？索罗斯和他的父母、家人一家都在这种双重身分之间，凭借自我控制求得幸存。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种屈辱茫然的感觉，即或当时被冒险的富于刺激性的快感掩盖过去，却永远烙在他的心底深处。

这种屈辱，对于一个不免有时要进行终极追问的哲学大师的弟子来说，相信是加倍的沉重：不仅有在强权之下逆来顺受的屈辱，还有不得不伪装，不得不表现得归顺臣服的屈辱。

自控就此成了索罗斯的习惯。即使到了今天，在别人眼晨他是那么老谋深算，进退裕如，索罗斯仍然生怕失去这种自控，他仍然仅防显出自己软弱的一面。但是他已在公众面前塑造了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形象，这种两面性带来的冲突和对这种冲突的自控，就更加令他烦恼了。

许多人注意到一个说来多少显得奇特的事实：索罗斯的慈善捐款一般从不捐给以色列的人们。而在匈牙利，索罗斯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既然童年和少年时有过目睹身历民族险乎被灭绝那样的经历，怎么能够对支持犹太人民族的事业置身事外？

而在索罗斯看来，这没有什么难以解释：一九四四年的经历，造成了他内心的疏离。

他承认说：“我母亲就具有反犹情绪——对自己是犹太人引以为耻。在所有文化当中，身为犹太人是一个鲜明的耻辱，一种劣势，一种残疾，所以总是有一种超越它、逃避它的愿望存在。”索罗斯家族姓氏就是很久以前从一个犹太人特有的姓氏改成今天这个

· 5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姓氏的。“匈牙利同化了的犹太人都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战胜这种自卑感。”

不过索罗斯以一种受过哲学专门训练的口气强调，他想逃脱的是“个别”：犹太人被另眼看待，而他不想被人另眼待。“我认为我正在做的正是逃脱‘个别’，这就是‘开放社会’的概念”。“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你固守在一个封闭的部落，你就连反犹情绪也不可能战胜。你能战胜反犹情绪的唯一途径就是你先开放自己。”

索罗斯深知他的论点会遭到驳斥，但他可不是容易动摇的。

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示：“我不否认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但我绝不想加入其中。”

人与人：交易关系？

有人说，索罗斯是一个冷漠的、精于算计胜过机器的老板。他虽然声称人会犯错误，自己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他却自视甚高，自认为是一个比别人犯错误犯得少、“更接近完美状态的人”。

在人际交往中，索罗斯把自己定义为与任何人毫不相关的人。他的满足感，是从对特定目标的实现，而从来不是从人际交往中获得的。

他与人常常是交易关系：别人从他这坦克得到什么，他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他与雇员的关系，最能体现这一点。

量子基金公司的大门，进进出出的已被千发马踏过了。有人坚持了一个星期，有些人只干了一天，也有些人没有被解雇自己却辞职了——因为尽管报酬极高，可给索罗斯干实在太折磨人——索罗斯是个专会瞄准他人弱点猛刺的专家，挖苦起人来用词尖刻，不挑动部下互相残杀就过不去，在雇员两败俱伤时，好加强他自己的控制。

他的一个前雇员说,索罗斯极讨厌亲密关系,大部分能量都用在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包括使用冒犯人的语言,当着众人伤你的脸面,更伤你的心。

据说有一次他刚刚雇来一组六个经理,就把他们全部叫到自己办公室,宣布说:“先生们,一年之内你们就会只剩下五个。现在走吧。”还怕这六个人不争得“乌眼鸡”似的,卖尽力气?

索罗斯在谈到内心冲突和疏离感时,也间接提到了他在公司内的人际关系。“在真正的我,和作为一个老板的我之间,永远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比如,我不会把私人生活和生意混为一谈的。即使我很喜欢的人,我也不喜欢与他们在私人意义上来往——利益问题跟着就来了,我得慎言慎行,所以就与我的自由发生了冲突。”

别人做生意,都建立在与别人良性交往的基础上,而索罗斯认定自己的“人际关系观”是正确的:不投入情感。

但是谁人喜欢一个不投入情感的人呢?

一旦承认成功,就会不再成功?

华尔街流传的一个笑话说:在著名的四总统头像的山岩对面,已经有一座瓣的头像在岸石上雕刻了,那就是索罗斯的头像。

但索罗斯对自己在金融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名气并不踌躇满志,意气洋洋——正相反,他甚至强烈地缺乏安全感。

曾有人问他,他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基金经理”,对此他怎么看?他马上答道:“问得好,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那么伟大了。但另一个问题是,我能这样伟大多久?”

很长时间,索罗斯拒不同意将自己看成一个成功的人。这不是因为伟大的谦虚,而是出自一个在旁人看来简直是开玩笑的理

· 5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由：因为不安全感——他惧怕承认成功。后来他自己在文章中透露，他一直认为一旦承认成功，就是不再成功的开始。

认为一旦承认成功，就是不再成功的开始。

索罗斯给出的分析又一次充满哲学家自省的气味：“当你是一个冒险家的时候，你总得要有一些律条约束。我所用的‘律条’就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可以令我时时如履薄冰，提防可能出现的难题，以便及时应付，不至于无法收拾。”

而一旦承认成功，就会动摇这种不安全感，松懈戒备状态，碰到麻烦的时候，会过分自信地觉得自己肯定应付自如。这样就开始丧失冲出麻烦的能力了。

听来倒也满有“福兮祸所倚，祸贫福所伏”的辩证思维的道理。但是久而久之，无时无刻不处在这种不安全感之中，总是觉得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从清晨到深夜神经永远不能放松，这就成为他享受人生，享受财富的障碍了。

如果索罗斯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永远一团糟，他就必须走出自己的心理阴影。

危机之后是转机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索罗斯的心理危机越陷越深，一步步滑下情绪的低谷：钱挣得真不少了，可他简直不知道把这些钱怎么用才好。

“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窘境：我是自己成功的奴隶，还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那时候，人与公司，索罗斯在这两者之间挣扎得十分苦恼。终于在一次次相持拉锯似的内心决战之中，遇到了自己的滑铁卢。

这是刚刚改名为量子基金的公司最为背时的一年——是它迄

今为止唯一赔钱的一年。

共同打天下闯江湖创办基金公司的搭档吉姆·罗杰斯离他而去了；而索罗斯自己家中也后院起火，婚姻触礁。

事业输了，伙伴没了，老婆走了——五十一岁的索罗斯进入了一段最为灰暗的时期，心力交瘁，他怀疑自己重整旗鼓的能力，并把这种怀疑大声地说出来，让以前对他坚信不疑的投资人赶快撤出量子基金公司。

结果，公司失去了大量资金——有人说至少有百分之二十多，有人说高达三分之一，还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公司的资金从四亿急跌到两亿！

索罗斯在与妻子分居后一段时间里变得离群索居，住在曼哈顿一处小小的、摆设简单的公寓里。他甚至去看了一段心理医生。

最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最有力的。

索罗斯谈及“一九八一年危机”时说，实际上危机早在他向吉姆·罗杰斯提出所谓的“三步策略”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当时极为成功，却否定自己成功。拼命地工作，生怕摆脱了我的不安全感就会危及我的成功。钱越来越多，责任和工作也越来越多——苦恼就越来越多。因为我仰仗着苦恼为一个作决定的工具。基金会已发展到一亿美元的规模了，我个人的财富也有两千五百万了，差不多了吧。我想，是承认自己成功的时候了。那怕这意味这不再成功下去了。

“我老觉得自己的成功全仗着自我否定，自我批评，自己折磨自己的态度。（我老是害怕）也许我会把下金蛋的鹅杀死。但是如果我把生活弄得越来越惨淡，下更多金蛋，又意义何在呢？我必须学会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了，要不然我全部努力岂不毫无意义了？！”

· 5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我觉得这个公司简直是一个寄生虫，吸我血，榨我的能量。我问我自己，谁更重要，是公司还是我？把公司当成我成功的桥梁，还是把我当成自己公司的奴隶？”

他想改变的就是这种苦恼、紧张和不安全感的态度。他打算接受自己成功的事实，抛弃对把握成功的不安全感。

在这场内心冲突中，量子基金公司输了，这一年它大赔特赔；而索罗斯赢了，因为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索罗斯公开了自己内心，承认过去对成功具有偏见。一旦让这些偏见公诸于众，他自己便认清那种偏见是没有道理的，得以摆脱了内心的阴影。

索罗斯跃上了一个新高度，不再当自己事业的奴隶了。摆脱了这些内心压力之后，索罗斯自己感到人生升华了，“变成了一个令人喜欢的、容易相处的人了”。

一手捞钱进来 一手捐款出去

当然，克服了对于成功的恐惧，并没有解决索罗斯心灵中的一切难题。他脑海深处还有一个又一个“黑洞”，比如，对与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他怀有一种自己是个“坏父亲”的内疚；比如，他对自己的死亡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迷茫……

而他身上最尖锐的矛盾，还是他内心的疏离流露反映出来的强烈对比的两面性——角色，性格上，道德上。

索罗斯一直想作一个哲学家，当年在英国留学，他所企盼的是成为另一个约翰·基尼斯(John Maynard Keynes)，或是阿尔伯·爱因斯坦。他可以花好多年潜心写作，修改哲学论文，在形而上的纯思辨的空间遨游。可是转过身来，他又在金融市场运筹帷幄，过关斩隘，被公认是个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赢家。

他用投机手段赚大钱，完全不讲“道德”，把市场竞争原则推向

新的极限(打垮英镑就是一例);别人很难想象就是同一个人,竟然会激烈抨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有人甚至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共产党”。

而在这一切矛盾的表现之后,经历过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中年危机”的索罗斯,又令人瞠目结舌地增加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对比:他要当慈善家。

这个老奸巨猾的投机商,专门在法律疏忽的所谓“灰色地带”大行其道,他精心设法钻税法的空子,这么多年来该付而少付给国税局的税款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他要拿出大把大把在金融市场上“巧取豪夺”来的钱去支持各种文化科学和社会救济事业了!

索罗斯越来越热衷于慈善事业,这当然可以解释为他“五十而知天命”,从所经历的中年危机中领悟到了许多人生真谛;可以解读说这位大亨认识到了挣钱并不是一切,将挣来的钱花在对社会有好处的地方才有最大的乐趣,人生的意义也就在其中……

但是又正是索罗斯自己打破了这种种听来十分美妙的“富翁回头金不换”的童话。他在向各种项目捐款的同时,并没有痛改前非,金盆洗手,放弃了对金钱的野心。他左手投机捞钱,右手捐款给人——同时。

两只手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吗?

对索罗斯该怎么理解?

要为自己心灵安宁求得一份补偿?

要在善恶天平上求得一点平衡?

要在世人憎恶的目光中挣回一顶桂冠?

矛盾的举止能长期并存在索罗斯身上,其原因——起码是部分原因——在于索罗斯从小自控,修炼出一种极高的平衡天分,能够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又干毫无关联甚至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件事。

而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两件事在他心目中,本来就并

· 5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非矛盾对立？

我们应该更详细地了解一番他捐款资助的作为了。

第六章

自己掏钱推动“开放社会”

(一九八二——一九八八)

· 6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美国《时代周刊》写道：“伟大的慈善家们通常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第一步，通过引起争议偶尔引发公愤的方式赚取数以亿计的金钱，第二步，将这些钱中的大部分捐给有大理石招牌的机构，比如大学和图书馆，于是公众的极度反感渐渐地化为极度的崇敬。”

另类基金会：不为赚钱为花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圣乔治”·索罗斯为封面人物，详细报导了这位精明的金融巨人致力多年的全球慈善事业。

开篇第一段颇有意味：“伟大的慈善家们通常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第一步，通过引起争议偶尔引发公愤的方式赚取数以亿计的金钱，第二步，将这些钱中的大部分捐给挂有大理石招牌的机构，比如大学和图书馆，于是公众的极度反感渐渐地化为极度的崇。”

索罗斯的第一步正是如此。他在金融市场上赚钱，尤其是一九九二年对英镑的杀戮，确曾引得千万输家切齿痛骂。

他的第二步就不那么简单了。他的慈善事业，不仅是化解公众愤怒的慷慨，更多的是他个人理念的“投机市场”。

八十年代初，索罗斯经历了人生最低潮的一段时光，他甚至求助过心理医生。而治好他的另一味灵丹妙药，正是他从这时起步的慈善事业。

一九七九年，索罗斯在纽约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此“基金”不是彼“基金”，量子基金主要的业务是赚钱，这个基金会则主要是花钱。办公室

就设在曼哈顿中城一个能俯瞰中央公园的建筑的三十三层上，会客室里陈列着他所写的关于金融和社会的著作，楼上就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贸易部。

索罗斯慈善捐款的动机常常遭人质疑。有人说，他的两类基金——一个是投资赚钱的基金，一个是捐款资助的基金，彼此利益界线不明。这种说法，使得索罗斯不得不避嫌：在选择开放性会基金会的地点时，避开他的基金公司运作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点索罗斯从来声明说不是问题，反正他的基金会在哪里都是独立的机构。

一九八六年美国通过法律，对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这样的企业的赢利课以重税。无可否认，税金负担的递增，也促使索罗斯在慈善捐款方面更加慷慨——干嘛要把自己挣来的大钱，全交给山姆大叔养那些官僚，推行那些自己很不以为然的政策？既然捐款可以抵税，倒不如捐给自己认为值得的事业。

索罗斯在金融投机上的成功，使他可以在慈善事业上一展他的慷慨。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于自己应该资助什么样的事业大费踌躇；自己算是个美国人呢，还是个犹太人，或匈牙利人？最后他想好了，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哲学导师波普当年所倡导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个世界性概念，超越一切种族的划分。“开放社会”是一个以“没有人垄断真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需要机构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让他们共同生活在和平之中”为共识的社会。广义的说，“开放社会”以其依赖法律原则、民主选举的政府、尊重少数意见为特征。

“开放社会基金”从点到线再到面

开放社会基金会，顾名思义，其宗旨是帮助“封闭社会”变得

· 6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开放”起来。

他在这个基金会的下面设立一个又一个分会。

第一个分会成立于一九八四年，他选择了自己的母国匈牙利，这是毫不奇怪的，不论他做出这种决定的感情因素是什么——我们记得，他很强调在生意上不投入感情，但是在捐款时他还是表现了对母国的感情——这种决定更反映了他的生意经原则：找一个能捷足先登的地方。

他的哥哥保罗回忆起与弟弟关于新蓝图的一次谈话：“在那之前，乔治一心只想在金融界成功，这时候他挣钱已经挣到每年上千万了，该想想用钱干点什么了。这个医院给五百万，那个学校给五百万，倒是方便，可乔治说自己有能力在东欧国家扶持开放社会。”“这是一个真空，从这个意义上，他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五百万到一千万，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匈牙利，意味着许多人可以活命了。”

这个率先成立的基金会，据说也为匈牙利的民主反对力量的地下政治活动提供了一笔资金。

索罗斯基金会于一九八七年底，以“文化倡议”(Cultural Initiative)名义在苏联设立分会，迄今已逾十年(一九九五年改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以前坐过牢的政治异议分子，现任俄国“开放社会基金会”执行总经理巴赫明介绍说，一九八七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释放被流放的萨哈罗夫之后，索罗斯视之为苏联走向改革的一个重要讯号，才决定行动。

早期基金会活动规模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赞助苏联学者、专家组团到西方国家考察、学习；另外，他给各文化与研究机构提供当时受管制的通讯设备、传真机与影印机。现在索罗斯坦承，这个基金会的实际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变化”。

目前除了莫斯科的总部，基金会在圣彼得堡、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和新西伯利亚等大都市还有四个分会，职员人数超过两百

人。

根据一项计划,索罗斯拟定在俄罗斯三十三座大学设立电脑资讯中心,以提供有关索罗斯基金活动的资讯服务并给大学师生免费上网的机会——索罗斯很重视网际网路,他认为自由资讯交流是开放社会重要条件之一。

索罗斯基金按每一百名大学生提供一台连上网际网路的电脑的标准提供设备,俄国政府只出网路时间费用,今后五年内索罗斯也将全部提供这些电脑中心的经营费用。目前已开设了十五家这样的中心。这些电脑中心跟地方政府合作,还给地方教育、文化、医疗机构提供免费网路服务。

索罗斯创办基金会的国家还有中国(一九八六年,一说一九八七年)、波兰(一九八八年)、保加利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乌克兰(一九九〇年)、南斯拉夫(一九九一年)、阿尔巴尼亚、波西尼亚、捷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一九九二年)卡萨库斯坦、南非(一九九三年)和海地(一九九年)等。

在这些国家的基金会的名称并不一致,像在中国,基金会的名称就叫“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但是这些分会,都是由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来协调。索罗斯于一九八七年建立了“基金会联盟”,正式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网络。

由东到西 全球“开放”

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以后,美国以前所规定的对共产主义国家投入资金的限制相应解除,索罗斯投往这些国家的捐款不再受到严格审查,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今天,索罗斯建立的基金网已遍及中欧、东欧、前苏联各盟国、中亚、南非以及中南美等三十余国,宗旨都是贯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念。

· 64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在各基金会里，人们对波普的理论振振有辞，俨然哲学讲习所。他们为波黑战乱的难民们送去饮水，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甚至资助吉普赛舞蹈团。对这些人来说，索罗斯无疑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

索罗斯批评其它慈善基金会更热中于讨好捐赠者而不是援助接受者，宣称他自己的基金会是与众不同的，在基金会的运作中，将尽量减少繁文缛节和来自他本人的监督。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他的基金会一共捐赠了三千万美元，绝大多数花在诸如为图书馆购买复印机、旅游资金、剧院、电影制作、社会研究、报纸杂志等项目上。

除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还创办了其它许多大型研究机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欧大学(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和国际科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一九九〇年，他在故乡布达佩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建立了中欧大学，后来又在波兰首都华沙也开设了分校。在其后数年内，这所大学招收来自二十二个国家的几百名学生，从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研究，攻读他们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曾化名写出震惊海内外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的中国大陆著名作家王雄提到，一九九六年夏天他到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着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着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征。门里主人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的研究生，她一谈话就会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和观点。”

可见，索罗斯创设的中欧大学也向达赖流亡政府提供资助。

索罗斯还曾为南非的教育事业提供过奖学金，但是一旦他感到自己没产生什么大影响之后，就又撤销了这项计划。

近些年，索罗斯把批评和要求改进的矛头转向西方。自称沉

洒于“撒钱的救世主幻觉”的索罗斯，以前给别国一掏就是上亿，但只有不到五百万美元捐给美国国内，用在像改进临终医护服务（他希望能倡导一种对于死亡和悲痛的更好的理解），改进向毒品作战等等项目上。但最近在他的捐款计划中，美国这个“第二祖国”开始作为一个重点了，索罗斯期望针对他所认为最严重的社会病，例如犯罪、教育质量低劣、少女怀孕等问题，“拿出必要的数额”通过各种计划来改进和改善。

索罗斯说，当他看到美国不能帮助东欧和中欧等国转入新的经济体系、建立新型政府的时候，就决定将他的努力提高扩展到美国国内。但是他又强调：他对美国国内的援助计划，不会使他收缩他在国际上的努力。

总的看，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捐助的对象主要是三大地区：第一，中欧、东欧和前苏联；第二，美国，第三，世界其它地区。

中、东欧和前苏联：包括艺术，文化设施，儿童和青年计划，英语计划，医学和健康计划和妇女计划。

美国：犯罪中心，社区和文化，援助合法移民计划，毒品政策研究中心，“死亡在美国”，开放社会奖学金计划，还有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少女怀孕，青年发展，法律行业道德，医疗，新闻……等等。

世界其它地区，项目也是五花八门。

与新的伙伴各有分工

开放社会基金会需要大量资金。但它本身除了接受捐款和得到利息，并无财源。所以索罗斯要想扮演大善士的角色，还得将原来的量子基金经营好。

“一个篱芭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与以前配合默契的罗杰斯分道扬镳之后，索罗斯开始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与他共同分担经

· 6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营管理之责。

这样的人并不好找，于是他又寻找可以取代他全部职责的人，这下弄得沸沸扬扬，都说他的公司陷入危机了，而合适人选择是没有找到。

索罗斯自己后来检讨说，他不该在那时候还不愿放下公司的经营事务，而专心集中精力解决人事问题，“我一边面试应征的人，一边还在忙着做投资的决策”。

索罗斯尝试改变公司业务和经营方式：将权力下放给其它基金经理，自己只当总监，不再事必躬亲。不过，公司在此后一九八二至八四年的运作毫无生气，证明此举并非妙策，离了他这个灵魂人物，还是玩不转。索罗斯又回到避险基金的老路上去，自己动手经营。

为了在重新回到投资市场的时候，做一个明智的投资人，索罗斯决定写一本书，总结整理自己的投资思路。

他认为，投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实验。“这种实验不是科学实验那种实验，而是一种炼丹术式的实验，因为我所期待的，是用我做的实验来影响结果。我希望影响是正面的。”索罗斯这本书就是他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

索罗斯的希望果然实现，他重出江湖亲自操作，基金公司又进入了高赢利时期。一九八七年的赢利情况好得不得了。更重要的收获是，索罗斯网罗了相当一批高素质的市场分析和经理人才，尤其是遇见了斯坦利·杜拉克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

杜拉克米勒当时是另一家大公司的基金经理，他看了索罗斯写的书以后很感兴趣，觉得索罗斯所说十分启发人的智慧，于是来拜访索罗斯讨论切磋，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索罗斯评价说，杜拉克米勒是个非常善于应付崩溃局面的人，

比他这个金融老手还强。索罗斯便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可是斯坦利是个忠诚之人,觉得在自己公司正困难的时候抽身而去有点不够仗义,况且他也指望能为公司挣到大钱力挽狂澜,公司一定会奖励他,因此谢绝了索罗斯的延聘。

杜拉克米勒在原来的公司坦克最终未能得到期望的奖励,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一身轻松地跳槽加入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索罗斯让他负责公司的宏观投资,自己则抽身去从事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去了。从这时起,虽然量子基金公司的老板仍是索罗斯,实际运作的多是杜拉克米勒了。

索罗斯看中的人,自然不会是等闲之辈。然而用中国的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太强的人在一起又往往不易共事。索罗斯与杜拉克米勒之间也有这个问题。倒不是两人之间有过什么冲突,然而杜拉克米勒来到量子基金公司的第一年里,干得并不如他自己所期许的那么出色;而他又归结为有索罗斯在上,总有自己的风格受到箝制之感,人也感到不自然,聪明才智不能顺畅发挥,这令他十分烦恼。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后,东欧发生变革,“城头变幻大王旗”,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索罗斯专心于东欧推动“开放社会”,在国际事务方面忙得不易乐乎,不再参与量子基金日常的投资管理运作。这对两人的关系来说倒是件好事;索罗斯不在公司,杜拉克米勒可以负起全责,两人之间可以发展一种被索罗斯称为“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杜拉克米勒有了问题可以来请示索罗斯,讨些主意,而不再感到索罗斯干预了他的具体运作,“抢了他的球自己去打”,两人的关系反而更为顺畅了。

在杜拉克米勒的主持下,量子基金在一九九一、九二、九三年又是赢利的高峰年,被索罗斯称为公司建立以来“又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随后的一九九四年虽获利极微,但有了前三年的好年

· 6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景,这种现象也属正常。

重要的是,公司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经营管理班子,索罗斯对这样的一班经营人马自是满意的了。

第七章

卷入红色中国政治斗争

(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第一，我在中国建立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十一亿人过上开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荣的生活；第二，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的项目也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颠覆内容；第三，基金会的钱，全部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我愿意接受邓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国来查我的这些帐目。”

推开紫禁城沉重的大门

索罗斯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最大、但过去长期被隔绝在“铁幕”后面的国家，所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深刻而激烈的变动，八十年代中叶日益引起这个自称秉持“开放社会”理念的金融投机家的兴趣。

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以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一九八四年，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变革的辘辘车轮也开始转动起来。

一九八五年，中国的干部队伍继一九八二年那一次大面积的新老交替之后，又在全国代表会议前后完成了更为重要的一次新老交替，大批年老衰的元老被安排辞去一切党政职务，退出政坛，具有改革意识和管理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出掌各级重要权柄。虽然中国的最高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政治元老手里，但是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毕竟吹起了日益强劲的清新之风。

一九八七年，经过约一年时间的洽谈和筹备之后，乔治·索罗

斯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为“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名称是深谙中国国情的人精心推敲的,在措辞上将索罗斯的原则理念与中国当时的口径两方面,衔接得珠联璧合。

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是根据索罗斯与中国经济体改革研究所在前一年所签下的协议成立的,而这个所的所长,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以“赵紫阳的顾问”、“智囊班子成员”在海外闻名的陈一咨。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于恩光出面挂名牵头(索罗斯是否知道于在中国体制中的真实身体,其说不一),由一个名叫梁从诫的人主持基金会的具体运作,接受和审查申请,资助很多符合推动“中国改革和开放”这一宗旨的项目。

据信当时在海外写作出版《革命之子》自传体著作而名噪一时的梁恒,居间牵线搭桥,对于推动索罗斯与中国方面的合作起了关键作用。

索罗斯一年通过这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向中国提供一百万美元左右。基金会运作一年多,索罗斯并不满意,认为比起在苏联和匈牙利的基金会来,在中国的基金会效果不彰。

亲自写信给中国强人辨诬

索罗斯确实直接寄了一封信给邓小平。

他在信中用毫不含糊的措辞说:“第一,我在中国建立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十一亿人过上开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荣的生活;第二,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的项目也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颠覆内容;第三,基金会的钱,全部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国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

· 7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索罗斯强调：“我愿意接受邓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国来查我的这些帐目。我也愿意到中国去向你们作说明。如果你们继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话，我还愿意继续提供资助。”

他还举出了美国报刊关于他是如何聚敛财富的报导。

随后，八月中旬，索罗斯委托美国律师科恩（Jerome Cohen，中文名字叫孔荣杰）到中国去，希望“能对一些被认为与基金会有关、因而遭到审查的人”有所帮助。

当然，中国方面不可能到美国来查索罗斯基金的帐。但这封信却很快就在中国的《内部参考》上登了出来。后来据传中国也回信给索罗斯，息事宁人。中国再批判赵紫阳和鲍彤的时候，绝口不提“与境外反动势力索罗斯勾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罪名了。

不过中国对索罗斯这样的人始终高度提防，虽不公开点名了，但仍不断号召提高警惕。例如一九九二年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内部讲话中列举六种敌对势力，第一条就点出“国际敌对势力把我国作为他们的重点目标”，“企图从我内部再物色一批政治上的反对派。事实证明，国际敌对势力正是利用各种合法的、公开的渠道，来掩护其渗透颠覆活动的。”不难看到，索罗斯大概就很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这种“国际敌对势力”的标笈。

他们无法直接指责索罗斯的合法与公开的活动，只好提醒将之作为“掩护”进行破坏的渠道。

对流亡精英也表失望

笔者在采访与索罗斯有过交往的人士时，听他们说过一个细节：八十年代中期，索罗斯访问北京，接待的人带他和他太太去参观由他慷慨解囊掏钱建起的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还安排了孩

子表演。索罗斯参观之后却很不满意,几年后他对认识的中国人回忆说:“他们组织孩子们给我们表演舞蹈,我一看就很反感:假得很!”

——这真是典型的索罗斯的尖刻。是啊,本身就来自苏联占领下的极权国家,他对于共产党所擅长的这一套早就烂熟于心,要蒙他是不容易的。

索罗斯对北京当局难抱好感,而对中国大陆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他虽然通过各种形式给予了一些资助,但是后来对他们也觉得失望。

一九八八年他曾有兴趣资助他们出版一份传播开放与改革信息的杂志,为此他与几位大陆旅美学者和记者进行了接触,要他们拿出个预算方案。

草案第二稿比起第一稿,起草人听了有关人士的善意建议,出于想把杂志办得更为正规专业的考虑,对编辑人员的劳务费提高了一定比例。

不料索罗斯读到之后却感觉不快。他认为,既然这些人是争取中国开放与民主的异议人士,是为了信念在拼搏,那么就应该不计报酬也要奋斗。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流亡者似乎比不上他过去熟识的东欧流亡者,那些人都是“业余干革命”,下了班办报办刊。

索罗斯形成了这种印象,说:“中国人就是要钱!”于是,这个资助异议人士出版鼓吹民主和开放杂志的计划,就此胎死腹中。

第八章

英镑终结者

(一九九〇——一九九二)

索罗斯本人承认自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冒险是他乐此不疲的事，巨大风险来临他才得以脑力高度集中，聪明地思考。

索罗斯以一个月赢利十亿美元的空前战果，得到“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的绰号。

欧洲汇率交换体系出现了裂缝

如果说到九十年代之前的索罗斯是金融市场上的奇才，是逐鹿的群雄之一；那么一九九二年九月之后的索罗斯，更成了金融市场上名扬全球、无人能出其右的顶尖高手。

一九九二年九月，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金融屠杀之一：索罗斯等人对英镑发动狙击。这是一个被众多媒体、用不同的文字多次报导过的一场大战。那一场混战的结果，是英格兰银行惨败，索罗斯成了最大的赢家——不仅大发横财，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因此，今非昔比。

要叙述这一场大战，得先从欧洲汇率交换体系(ERM)说起。

英镑曾是 ERM 的组成部分，ERM 的存在很有渊源，它是一九七九年由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建立的，旨在维护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相对稳定。

ERM 在一种近平均衡行的条件下运作了很多年，已经非常成熟，它自身包含着不断调整的机制，这些调整之间并无大空子可钻，远远不到能让索罗斯这类投机商从中赚大钱的程度。索罗斯自己也曾承认：当年的 REM 是一个近平均衡的体系。

但是，这套体系只有在欧洲各国协调了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才

有可能发挥作用。如果某一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别国，这个体系就会面临考验；不同的利率也会造成破坏力。当欧共体十一国之间的利率——欧洲的中央银行无不痛恨那些专炒货币发大财的投机商，因为他们往往成为这些投机家从中混水摸鱼赚大钱的目标。

过去，强大的中央银行严阵以待，众志成城，通常令投机商无计可施，所获有限。但是时代变了，随着苏联的解体，东西德国的全并，欧洲的格局大变，这个均衡的 ERM 这个均衡体系潜在的裂缝，逐渐就变得无法掩盖了。

英镑摇摇欲坠

德国中央银行在 ERM 体系中曾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 ERM 的重要依托，又是德国货币稳定的保护者。

在 ERM 相对均衡的时候，要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倒还问题不大，可东西德国一合并，货币一统一，而东德货币与西德马克之间的汇率相差又那么悬殊，更何况这其中还有比经济现实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德国中央银行的双重角色就演不下去也不想演了——因为保护德国货币与构成 ERM 核心就成了两个互相冲突对立的角色。

据《福布斯》杂志的分析，当时英镑对马克的情况，的确使欧洲货币的投机者有利可图。从一九八七年起，几种主要欧洲货币就被紧紧拴在一起，形成近乎是不变的对等价值，并以强壮的德意志马克为其核心货币。比如，从一九八七年起，英镑与德意志马克的汇率被固定在一比二点九五。这一固定，对英镑的供与求之间就难以出现合理平衡的机会了：为了保持这个兑换率，一旦英镑供过于求（或说德意志马克求过于供），英格兰银行必得有足够储备为维护英镑而卖出马克，以尽可能买进过剩的英镑。而这种被称为

“干预”的做法，却因英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受到限制。当然，英国政府可以再举债供马克，但借了之后亏空更大，最终还是赔不起。

要是不锁定汇率呢？不锁定，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英国可能提高利率，吸引人们多买进英镑。可是一九九二年九月的时候，恰恰没有这种可能：英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更需要的是大大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哪里还能再提高利率！

于是就只有第二种结果了：兑换率浮动——停止中央银行的干预，让市场通过波动去协调各国间货币的兑换率。这就是索罗斯说的，英镑的贬值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最后发生的事果然无可选择，就是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放开，浮动起来，于是英镑贬值，一英镑从兑换二点九五马克，跌到二点三五马克。

借大钱 冒大险 发大财！

当柏林墙一倒塌，精明的索罗斯就有一种直觉：欧洲的货币混乱将要开始。他有机可乘了。

索罗斯是一个乐于倒钱的角色，下午就乐意卖出他早上才买进的不论什么。他寻找的是某种期货（股票也好债券也好货币也好商品也好）的市场价值，与他自己认为的真正价值之间的差别。

当市场价值大大出线，而他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时候，他会不惜借货高出他自己的资本十倍甚至更多的钱，来占据一个位置。作为一个生意人，连索罗斯本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冒险是他乐此不疲的事，大风险之中他才得以脑力高度集中。“我需要因冒险而产生的刺激，才能让自己聪明地思考。”这也许是索罗斯对自己进攻型投资策略所做的最赤裸裸的评论了。

· 7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一九九二年夏末，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对一群大亨的一番讲话给了索罗斯第一个讯号。总裁提到欧洲货币有不稳的可能，投资商们如果以为各种欧洲货币一成不变就错了。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不大可靠。

听者有心。索罗斯闻讯便开始行动，先对意大利里拉下了手。他首先放空了里拉，里拉果然“应声而倒”，被挤出ERM。这是一个很清楚不过的信号：英镑也会同样不堪一击。

索罗斯在里拉上赚的一笔钱，也给他冒一冒在英镑上赌上一把的风险垫了底。

一九九二年九月，索罗斯看准在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英国将被迫放弃对兑换率的锁定，英镑大幅贬值迫在眉睫。

欧洲货币之间本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维护这个固定价值和防止货币投机的一个关键，就是欧洲各国将利率保持在相同水平。甚于对哲学和人性的理解，索罗斯估计，欧洲各国断不会因为英国有难，就调整自己的利率——也就是伤害本国经济——来保护ERM，拯救英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索罗斯全力以赴，马上以百分之五的保证金方式大笔借贷英镑，然后以一比二点九五的汇率用英镑购买德国马克——索罗斯的策略是，在英镑汇率未跌之前用英镑大量购买马克，等英镑汇率暴跌之后再卖出马克，还掉当初借贷的英镑，余下的就是净赚，这样一转手就可以获利百分之十，甚至更多。

当时这么干的人不只索罗斯，许多精明的人也在赶快借贷英镑，以一比二点九五的兑换率大量购买马克。

索氏有一个“互动论”，他认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改变人们的认识。比如投资者认为英镑会下跌，就会拼命抛出，英镑就会有所下跌。而英镑一跌，就会使更多人认为英镑倒了，大家都跟风抛出，英镑自然就真的跌了，更何况本来就应

该跌的英镑呢！

英国人的“黑九月恶梦”

金融市场上一场超大规模的决战就这么打得天昏地暗——当然，这里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血影，只有电脑荧屏上的一串串阿拉伯数字在说时迟那时快地急速变换、攀升下滑，巨额的钞票迅速地从这个帐户流向另外的帐户。

巩固中央银行竭尽全力拼命抵抗，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外汇，企图用官价买回英镑，以防止英镑大幅贬值，无奈储备不足，又未能说服德国建立统一战线，在同一时间降低其利率。有心抗“贼”，无力回天，终于未能阻止英镑的狂贬，兵败如山倒，最后带着遍体伤痕，如意大利里拉一样，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交换体系 ERM。

在一个月的风暴狂飙之中，索罗斯战果最为显赫。美国著名的《福布斯》(Forbes)事后撰文说，据可靠的报告，他“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间，就把十亿美元吞下去了”。

净赚十亿美元！？在他之前还没听说过有哪个美国人能在一个月之内挣了这么多的。当时全世界已有了数不清的避险基金公司，有许多公司总资产都在十亿百亿美元之谱，很多人也在英镑大战中大有斩获，但没有哪一个敢像索罗斯那样，不惜一次押上了一百亿美元的大注。

赔了血本的人没法不痛憎爱分明这个让他们输得一败涂地的索罗斯，但也没有谁不承认他是个大赢家。索罗斯因此得到“英镑终结者”的绰号，被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请注意，这个称号绝无贬斥，倒是带有惊佩之意。从此，索罗斯在金融市场说话就有了一言九鼎的份量了。

他赚了，就必有人赔。首当其冲的输家是中央银行，而实际最

· 8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终受害人，是纳税人——他们简直就是签了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给索罗斯，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真是血淋淋的抢劫和杀戮！”

索罗斯可不管这些，没错，我干了，谁让你们没法拦着我？体制如此么。“当局应该设计出一种不让投机商钻空子的体制嘛。”鲨鱼是闻见血腥味才奔了猎物来的，索罗斯心安理得——ERM 的确有空子可钻么。

后来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时，ERM 又一次崩溃，法国、丹麦、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货币对马克都告贬值。不过，比起一九九二年的英镑来，他们的贬值幅度要小得多了。所以，到目前为止，索罗斯对英镑的一战，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一九九二年九月，成了全世界的金融界人士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月。

获利全部捐出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还不算完。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就在打垮英镑之后的三个月，索罗斯宣布了自己更大的捐款慈善计划：他将向处于战火中的波西尼亚提供五千万美元，为俄罗斯的人文科学提供二点五亿美元。

这是他宣布的捐款计划。实际捐了多少？我们这里有几个索罗斯捐款的数字：

一九九四年，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三亿美元；

一九九五年，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三点五亿美元；

一九九六年，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三点六二亿美元——他是美国当年最大的捐款人，比第二名的一点五五亿要高一倍多；

一九九七年，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五点六亿美元，居当年第三。

把这几个数字一加，四年中共捐款十五点七二亿美元——从打垮英镑中所赚的，连本带利又全都捐出去了。

第九章

从金融名人转变成公共政策名人

(一九九三——一九九六)

名声是一种资产，因而需要加以认真经营。“我没有舞台，所以我有意图用打垮英镑这件事来给我自己创造一个舞台。”

索罗斯想要影响力——他要做一个“拯救世界”的人，而且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世界

不满足于仅仅以“有钱”闻名于世

如果以为索罗斯玩这些投机大手笔的游戏全是为了钱，就太小看了他了。

索罗斯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很有钱了，而且在生活上他并不特别讲究奢华。金钱本身和物质享受显然不是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索罗斯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仅仅是以“有钱”或者是“能挣钱”闻名的亿万富翁。一位从六十年代就认识索罗斯的投资专家曾说过：“乔治是一个进攻性理财好手，但他却具有一种欧洲式雅致。虽他其实又贪婪又咄咄逼人，显出来的却比那个有风度得多了。”

许多年来，索罗斯一向本不是个爱抛头露面的人物，突然之间他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角色，走到聚光灯下来了。

他的这一改变动机是什么呢？

九十年代初以前，索罗斯除了在金融界闯出点小名号，在社会上几乎籍籍无名，他服膺并热衷宣传多年的理念，为此向东欧各国的民主运动和文化教育项目提供了大量资助，在欧洲也算有些知道他的人，可索罗斯仍然深感挫折：他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在西方世界给他带来任何政治影响。

“我想见布什总统，和他谈一谈与当时苏联如何接触的办法，但只到了和副国务卿通了一个电话的层次，之后就没进展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写一本书。在此之前我还试图见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我想让她向苏联提供一项可称为‘撒切尔计划’的资助，我当时觉得她是唯一可以领导世界前进的人，因为她在美国、欧洲都有号召力，可是我根本见不到她。她卸任以后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为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设想来听听意见的。我也见不到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害怕讨论经济，所以他不肯见我。所以尽管我很活跃，也很有影响力，却见不到我想见的人。”

“我没有舞台。所以我有意图用打垮英镑这件事来给我自己创造一个舞台。”

索罗斯这句话并不完全可信，但是击垮英镑一举，使人们开始注意这个非同小可的索罗斯，确是事实。

“我获得名声一不是因为我的慈善事业，二不是因为我的理念，而是因为我的挣钱能力，这真是太讽刺了。因为我打垮了英镑，使我的名声如日中天。我们这个社会最推崇的价值就是如此。”

索罗斯说话的音量果然在增十倍百倍，过去高攀不上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对他来说再也不是远不可及，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了。

他想要影响力。他要做一个“拯救世界”的人，而且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世界。

从低调转向高曝光率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在对布达佩斯的一次造访中，索罗斯来到十四岁之前住过的一处公寓对面。

当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他和家人化名藏在这里。索罗斯指着公寓楼上一扇大窗户，对身边二十三岁的儿子乔纳森（Jonathan）说，当年他曾坐在那个窗前，一坐几个小时，静静地看窗外的小河流淌。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镜头，当时正跟着索罗斯拍摄记录片的一个英国电视台摄制组抓住了这个场景：索罗斯故地重游，来到当年藏身的地方，凭吊父亲营造的避难所。

恰在此时，一辆旅游车缓缓驶过，索罗斯看了旅游车一眼，突然大笑起来，对儿子说：“我简直可以听见导游在说：‘那位就是乔治·索罗斯，正在讲述他的童年。’”

过去他可是不干这个的。从一九六九年起，他就经营了一本万利的基金公司，索罗斯凭着艺高胆大，在金融市场上纵横捭阖、冒险投机，下大本投大注，资本已不知翻了多少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和这一行业中所有人一样，信奉的是求实不求名，人过不留影。在他八十年代就开始援助东欧的事业中，他也保持了很多年的低调。

不过，自打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被推翻之后，索罗斯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重新安排自己的位置了。

他把投资赚钱等日常的操作，统统交给斯坦利·杜拉克米勒，自己则全副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事务中——当时他为在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的四个基金会业务忙得不亦乐乎，大大增加了他捐款的数量。

同时，他开始致力于让西方世界也学他的样子，对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增加援助，以加速那里的民主转型和市场化进程。他把这个设想，称作与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相提并论的“又一个马歇尔计划”，满心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方案。不过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进展却非常不顺利，因为没有多少人肯听一听这个计划

的意义。”

直到英镑危机发生，索罗斯一夜之间成了名人，整个事情才来了个大转变。

索罗斯自己总结这一转变时说，过去他的确不多在公众面前曝光，一九八九年之前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避开媒体的，转折点是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想要提出很多很好的设想时，他发现自己说话没有人听。“人人都说我很有‘威力’，但这个‘威力’由什么组成？我搞不懂‘威力’这个概念。我可以改变市场吗？也许可以，但只有我正确估计了市场的方向的时候才可以。我能够影响政府吗？我开始有这个能力了，但只有当我建立了名声的时候。”

对赚了大钱大肆张扬

索罗斯做出了改变自己形象的决心：要当一个公众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的名人——这个决定实际上正如他在英镑炒作中所采取冒最大风险的手段一样，是一种策略上的决定。

一九九二年九月英镑大战中，英国政府为保住英镑花费了六十亿美元而终告失败，赢家不止索罗斯一个，众人都静悄悄地赢了了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样一场戏里当众人瞩目的主角没什么好处。

可是索罗斯却与众不同。

在危机过后几星期，索罗斯给他的老朋友，泰晤士报金融新闻记者安纳陀尔·凯勒斯基（Anatole Kaletsky）打电话，安排了一次采访。

索罗斯对凯勒斯基公开坦承舆论的推测：他的量子基金公司调动了大约一百亿美元来打垮英镑，其中大约九十亿是供贷的。他还说，量子基金公司以及合伙人此举总共获利二十亿美元。

——老天，谁把自己赚多少钱公诸天下呢？

不仅如此，索罗斯还宣称，在英镑崩溃的前几天，“我们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此直言不讳，令他在金融界的同行，包括量子基金公司的头头脑脑和持股人，也都吃惊得几乎晕厥了。许多人都被他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为什么要谈这个？为什么要招人注意？”

在别人看到其坏处的时候，索罗斯却看到了机会。索罗斯最想要的，正在于让众人听自己的理念。这一次他又下了“注”，来赌自己能够从一个金融名人，转变成一个公共政策的名人。

这么招摇过市大谈打垮英镑，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产生了对索罗斯极为不利的影响。索罗斯的基金公司与世界银行的下层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计划有着共同投资的合作。每次讨论这类投资的时候，世界银行里有决定权的委员中，总会有人说“我们这样的多边计划应该让索罗斯掺合进来么？”

不少人中间有着这样一种情绪——那个索罗斯对英镑所干的那事，实在是太缺德了！

不过，索罗斯尔后的一系列慈善之举，又大大软化了人们的这些反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他在伦敦宣布，将向波士尼亚提供五千万美元的人道援助；拿出二点三亿美元资助中欧大学；又拿出一亿美元为前苏联的科学家创立了一项奖励计划；再拿出二点五亿美元资助俄罗斯的文科教育事业。

索罗斯称，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十分满意。“一些专制国家的独裁者都突然变得很乐意会见我了。我在东欧各国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而在美国，“我的话也很被当回事了。”在西欧也有着同样效果，“所以我可以就波西尼亚之类的大问题发表意见了。这正是我想做的。”

公众形象的转型

索罗斯知道自己的形象是一个可以改变市场的力量，于是他继续致力提高他的名声，把这种名声看做是“一种资产，因而需要加以认真经营”。但他强化自己在更广泛的方面焕发光芒的同时，也想削弱自己在金融方面战无不胜的神话。他甚至唯恐自己在金融方面被人奉为偶像，才能被人言过其实，会妨碍公众对自己更重视的许多理念的关注。

当一九九四年二月量子基金公司借债对抗日圆，在一天内输掉六亿美元的时候，索罗斯抓住时机，对这一失利大事张扬，其实后来由于日圆疲软，这个损失大部分又弥补回来了。

据斯坦利·杜拉克米勒说，当时索罗斯对他说：“我们要让天下人知道，我们也只是人，不是神。”

几年前，索罗斯雇用了一个公共关系助理，主要负责他开放社会基金会方面的公共关系事务。他开始出版自己全部关于公共政策的讲演，把它们印成成百上千的小册子，然后送给全世界的企业界、政府、大学和大众传播媒体。

他频频地在电视节目上出现。到了夏天，索罗斯会邀请一大堆贵宾到他家里来做客。过去的贵宾中，多是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衣冠不整，“穿着睡衣与索罗斯下象棋”。而现在，来这里的宾客体面多了，气派也大多了，不少是华盛顿达官显贵。

曝光率大增，公众影响大增的一个后果，是他既作为投机家、又作为慈善家，既作为赚钱顶尖高手、又作为开放社会护法神这两种角色之间，越来越难以协调。

索罗斯自己也说，“现在我已经赢得了这样高的知名度，两件事情各行其道就变得不再可能了。”

国家的财源还是威胁？

索罗斯的公共关系方面的见解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不错，现在有更多的政客和社会活动家愿意倾听他了；但是，他们愿意听从他么？

索罗斯最近对美国的民主党大感兴趣，有文章说，他对克林顿政府产生了以前无法产生的影响。然而考察这一影响，他仍然是被白宫更多地视为一个“金融大师”，他的对外交政策的观点则往往是被看做“不在行”的。

当他去见克林顿要谈波西尼亚问题的时候，克林顿却只想谈市场。政府中一位高官曾说过：“有时候，他（索罗斯）的讲演和文章过于理想主义了。于是人们不把他当一回事。”

不过，他和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层官员之间已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并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一个助手这样形容过：这个办公室就等于是索罗斯“自己的国务院”。他把这里作为据点去游说国会议员，为从前苏联脱离出来的共和国申请西方援助。后来，他又表示要致力于在西方世界积极寻求道路，使“我们自己的开放社会更好地发展”。

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后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莫顿·阿卜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曾说过：“政府里的人们那时候都不理会索罗斯，这人一心只想着匈牙利。他现在却是真要干点什么了，对政府也毫无耐心。我一直都这么说，乔治是美国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外交政策，而且能够实施它的人。”

副国务卿塔伯特（Strobe Talbott）对“索罗斯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反应是：“他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是一回事，但他可以与政府的政策兼容共存。这就像与一个友好的、同盟的独立个体一道

· 9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工作，我们努力与德国、法国、英国，以及这个索罗斯（笑）同步，以达到对那些前共产国家的共识。”

在外交界现在很流行一种说法：鉴于政府既无意愿又无财源像过去那样对许多国家进行援助，这个真空就该被一些私人机构来填补。有人认为索罗斯正是这样一个范例。有人甚至说索罗斯就是国家的财源之一。

不过也有人不无担心地感觉到，拥有上亿灵活资金的索罗斯是个威胁。他完全可能只按自己的法则行事或按自己的意愿去修正法规。如果哪个国家领导奉承他不够，就很可能得罪他——钱是他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他会形同一个专制君主；他又是那么热切地要对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施加影响。

据一位在政府中工作多年，又熟悉索罗斯的外交政策人士评论，索罗斯表现了一种古典式的傲慢，“你介入局势，你有钱，你认为自己能操纵一切。”

就连一些觉得自己喜欢索罗斯的人，也觉得索罗斯很有几分“救世主”的自我感觉。美国援助苏联新独立国家协调员托玛斯·西蒙斯(Thomas Simons)就曾说过：索罗斯很有“把自己看做太阳，其它行星都围绕他旋转之势”。

不论是将他看成国家的“财源”，还是看成操纵他人的“救世主”，有一点是清楚的：索罗斯找到了自己想施展的场地——他“一心要介入的是国际政策领域”。

一个在市场上赢了这么多次的人，一定觉得赚大钱已经没有什么刺激了，就是再赢也不再有多少胜利的快感。索罗斯显然很向往在新的领域里享受新的乐趣，他说过：“处理国际事务是很刺激的。”

从这个新的起点上，索罗斯回顾过去，更为未来设计了战略。

他是一个能吸引各层次目光的人：衣着永远剪裁精美，这令他

看上去又健壮又朝气蓬勃。他更特别的是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十分有把握的气质。他用他那种特有的匈牙利口音,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他这辈子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具有了这种实力,使他感到可以排除一切阻碍地向前迈进了。

第十章

乔治与苏珊

索罗斯面对的是“俗而又俗”的金钱，有时回到书斋，读的写的也是枯燥得像砖头般的哲学论文。

而妻子苏珊置身于装潢艺术这一片光影与色彩的“雅之又雅”的天地。

他与她，似乎处在人生光谱的最远两端。

但是他们结离十五年了，仍然相得益彰

第一杯苦酒

索罗斯是个有个性的富豪。

凡是富豪，在世人眼里都具有某种花钱的怪癖，而索罗斯，如果称得上有某种“怪癖”，就是没有任何怪癖。他对于豪宅、华服、名车以及种种其他的富豪都为之醉心的东西，都兴趣缺缺，也没有大兴土木经营一个封闭和囚禁自己的神话宫殿。有闲暇了，他会打打网球，滑滑雪，或是在海边散散步。

佩带金丝边眼镜的索罗斯，看起来更像一个哲学教授。

他很少与其它金融家往来过纵，拒绝一切俱乐部和社团活动，却愿意与能够争论哲学问题的人在一起，如波兰持不同政见者 A·米尼奇克，匈牙利经济学家塔尔多斯，哈佛经济学家、震荡疗法的推行者杰弗瑞·赛克斯(Jeffrey Sachs)等。

外人看得见的财产，只是他在纽约的南安普顿有一所海滨别墅，在纽约上州的威彻斯特有一所乡村住宅；另外，他在英国伦敦有一处公寓，供他在欧洲处理慈善基金会事务，需要带着妻子和幼儿常驻英国时全家居住。

有关索罗斯的各种书籍、报刊文章、网络资料汗牛充栋，但其

中涉及他婚姻家庭、妻子儿女的内容却少得几乎没有。索罗斯不喜欢谈论这些，也不喜欢媒体就此大作文章。

一九六〇年，索罗斯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前一年，他与安娜莉斯·维茨莎克结了婚，两人育有三个子女：罗伯特，安德利亚，乔纳森。

除了他们的名字，几乎再没见过媒体对他们有过任何报导。从索罗斯对于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的内疚来看，可以感到索罗斯与这三个子女的关系不睦，但究竟发生过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

索罗斯也没有过对这些孩子作过任何描述和评论，唯一知道的是，索罗斯对与他们关系的破裂而十分自责。

索罗斯人生最低潮的一九八一年，不仅他量子基金公司的合作伙伴吉姆·罗杰斯离他而去，他生活中的合作伙伴，妻子安娜莉斯也离他而去。他同三个子女的关系也因此受到损害，使他感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悔愧”。

索罗斯曾提及他的前妻“曾给我极大支持，容忍我为了投资生意而不顾家中妻小很多年”。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地谈到过她。

索罗斯在曼哈顿一处陈设简单的小公寓里离群索居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看来这个打击虽然沉重，却对他起了正面的作用。他后来说：“那段时间里，我的个性经历了相当大的改变。我的情感世界里很大部分是负疚和羞耻。”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索罗斯与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的苏珊·韦伯(Susan Weber)结婚。

第二次结婚之前几天，他才与前妻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吸取了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又在人生低潮期蹒跚了一大段，索罗斯在第二次婚姻中一变而为一个讨人喜欢且容易相处的丈夫了。“我可以肯定，我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对我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曾对现在的妻子苏珊谈起我过去是个什么样子，可我想她是不会相信的。”

在媒体关于索罗斯连篇累牍的报导中,对苏珊很少提及。只说她曾是一本艺术杂志的发行人,从事艺术史研究。后来在曼哈顿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创办并主持装潢艺术研究中心。索罗斯为她的研究所提供了部分资金。

索罗斯和苏珊育有两个儿子:亚利山大和格利高里。

有钱真不错

其实苏珊·韦伯·索罗斯也是美国名人录榜上有名的人。一九九六年,她获了“妇女财政发展成就奖”。

对她的报导少,大概是因为她自己只接受对她的艺术事业方面的采访,而对自己与索罗斯的私人生活则守口如瓶。在她家中,两个孩子的房间在楼上,那是不对记者开放的。

苏珊是个制鞋商的女儿,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索罗斯二十六岁从英国初闯纽约的时候,她还是个月步婴儿呢。

她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大都会,一九七七年,在纽约市的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这所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姊妹学校,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到一九三年才允许女生入学,在这之前,想进哥伦比亚上课的女生得报考它对门的巴纳德学院。

索罗斯与苏珊的差异不仅在于年龄,更在于兴趣领域。索罗斯面对的是美元、英镑、法郎和德国马克这些“俗而又俗”的金钱,有时回到书斋,读的写的也是枯燥得像砖头般的哲学论文。

苏珊则置身于一一片光影与色彩的雅之又雅的天地:一九八〇年开始,她就担任《艺术史笔记》杂志的出版人至今。一九八七年她获得纽约 C.H.P. 设计学院硕士学位。

他与她，似乎处在人生光谱的最远两端。但是他们结离十五年了，似乎仍然相得益彰。苏珊需要丈夫的财政支持，而索罗斯则需要妻子的艺术品味来调剂人生和平衡神经。

苏珊二十八岁那年与五十二岁的索罗斯结婚后，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她是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执行总裁，随着索罗斯到处奔波。

曾有记者问她：如果没有结婚会干些什么？

她说：“我就会早几年就拿到硕士学位了，那样我会更多地与装潢艺术打交道。与乔治结了婚，就得适应他的生活和他的方式。没过几年，我就觉得我自己有麻烦了。我会嫉妒那些经我手管理和资助的文化计划。”

此外，她还透露，“两人一道工作又一道生活，总给家庭带来紧张气氛。我想干点自己专长的事业。”

一九九一年，苏珊在人生道路上迈出自己的步伐。她为申请C.H.P.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主任的职位，精心起草了施展才能的蓝图，足足写了有十五页改进的计划，却没有得到能得到这个职位。不过对她来讲，这未必是打击。苏珊想，既然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设计自己的计划，干嘛不找个地方来实施它呢？

钱不是问题——身边的丈夫就是座非同一般的金山。有索罗斯掏钱，巴德学院的院长也同意了她在巴德学院设立这么一个研究所。

她花了两千一百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西八十六街十八号买下了一座一九〇六年的小楼，又花了四百五十万美元装修，还从C.H.P.设计学院挖来了一些人才，创办了她自己的学校——巴德装潢艺术研究中心。

C.H.P.设计学院当然十分不满：“太肆无忌惮了，不就因为有钱嘛！”

有钱真不错。虽然花了这么大一笔天文数字,对索罗斯来讲,只是个零头则已。

在几年里,她经营得有声有色,第一批二十名装潢艺术研究生毕业了,举办了一系列颇受好评的艺术展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看过之后,很用了些热烈褒扬的词汇。

现在巴德装潢艺术中心的年预算是四百五十万美元,来自学费、捐献和基金会拨款。这里提供两年硕士学位的项目,还准备开设培养博士学位计划。

把装潢引入艺术世界的中心

装潢艺术历来不大受艺术世界重视,挤在这个天地的边缘。

美国不像欧洲,毫无把装饰艺术作为国家遗产来保存和尊重的传统。这里创造任何艺术品都是从营利角度来衡量。同时,美国人也知道自己没有太长的历史,于是有钱人就靠买欧洲古董来寻找正统。“可以用来资助当代艺术家的钱,被富人全花在古董商店了。”

而苏珊的功绩在于,使这一艺术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心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眼中的装潢艺术,不仅是给家居增添美感的装饰,而主要是历史文献和创造。”她和这番见解,终于逐渐有了更多的认同者。

像巴德装潢艺术中心这样能授予装潢艺术高学位的机构,在美国只有三处,其它两处是德拉瓦大学博物馆专业和 C. H. P. 设计学院。有人称:巴德装潢艺术中心是装潢艺术界需要、呼唤了五十年的学校;但也有人讥笑苏珊创办自己的学校不过是有钱人的一种花钱方式——苏珊得以建立自己热中的文化事业,的确因为丈夫富有,而旁人有些蜚短流长,这也不足为奇。

然而这样一个热中于当代装潢艺术的人，家里倒没摆太多艺术的玩意儿。苏珊和索罗斯在第五大道上的公寓里，摆放的多是些英国十八世纪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从门前看，几乎可说没有什么色彩。“我丈夫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只喜欢实用的住处。”

索罗斯对妻子的这些奋斗和成就“非常自豪”。不过，自从苏珊干了这个，对于索罗斯来讲究不十分方便了，因为索罗斯一年有六个月是在外旅行，而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随着他为生意的事到处奔波，尽管她还是尽其所能帮助丈夫的基金会做些工作。

在曼哈顿、威彻斯特、长岛和伦敦的几处家中，都是苏珊在操持。她还申请攻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博士学位，准备提交她对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 and 设计师高德温(E. W. Godwin)的研究论文。她也继续为巴德学院带来滚滚财源，一次就捐过一千三百万美元。

除了这些，就再也没有什么关于索罗斯夫妇私生活的报导了。

有件事似乎可以说明索罗斯家为何尽量避见媒体。

一九九〇年，随着东欧基金会事业的进展，索罗斯带着妻子和两个幼儿搬到伦敦长住，以方便来往于东欧之间。住了约一年，苏珊因为男管家擅自喝了家里的名牌香槟酒，而将之解雇。

这件事被各小报大肆渲染，男管家后来提出起诉，让索罗斯家赔偿损失，这场官司他告赢了。苏珊被新闻媒体弄得十分烦恼，在伦敦住不下去，一家又搬回纽约。

直到今天，话题对索罗斯还是提不得。索罗斯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倒不专指这件事)：“有些富人喜欢小报描写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这更令乔治讨厌的了。”

●下篇

英雄造时势

索罗斯是否想到了：他这一个“抛售全部泰铢”指令下达，将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本世纪末最大的一场经济灾难？

如果他想到了，他是否还会这么做？

第十一章

掀起惊涛震荡天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月）

索罗斯早早地来到他的曼谷投资公司办公室，仔细审阅助手们连夜为他准备好的全面出售泰铢股票，可转换证券，现钞，和现汇的有关文件。他看准了泰国货币铢的价值被高估，政府的外汇储备量无法承担外债的偿付压力。

确定一切无误以后，他拿起了电话，下达了立即实施既定计划的命令。

其时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

“增长王国”之都：泰国曼谷

在本书的以上章节里，我们与读者朋友们一道，对当世奇人索罗斯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作一番深入的考察，看到他是怎么样一步一个脚印，达到如今这样的人生巅峰的。

如果说，他在以前的生涯中虽然也曾被人侧目而视，但毕竟还是誉大于毁，那么一九九七年则是他在世人眼中形象大变的转折点，这一年，成千上万的人对他大动肝火，愤怒谴责。

这当然是因为他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呼风唤雨、兴波作浪的关键人物。

以索罗斯为主的国际金融大炒家，在东南亚危机中，首先是向泰国货币铢下的手。

他们为什么选中了泰国作为发难之地？我们有必要把泰国当时的经济和神经和社会背景作一番说明。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泰国首都曼谷。灿烂的阳光抚照着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绚丽多彩的各种鲜花盛开在街心公园和路边

屋前。街道两旁高挺的椰子树在薰风中轻轻摇曳，描绘着一种醇浓的热带异国情调。

这个信奉佛教的国家，以其平和的笑容，就象无数庙堂中佛陀安祥的慈颜，欢迎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游客。

清洁的街道上各种机动车辆来往如梭，一片繁忙景象。从超豪华的大商场到简易小商店甚至路边摊贩排档，各种品类和档次的泊来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顾客盈门，行人熙攘。

泰国曼谷，这个世称为“增长王国”的繁华之都，正在享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

十多年来，泰国的经济保持着百分之六的平均年增长率。外贸出口量直线上升，带动了制造业——主要是低附加值和劳力密集型工业，以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亿万外资为泰国经济繁荣所吸引，潮水般地涌向这个市场看好的国度寻求利润和增值，同时也给泰国带来发展资金和就业机会。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泰国神话般地快速发展，使她与其他东南亚邻居一样，被举世赞誉为“经济奇迹”，也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仰望，引用为他们发展的样板。

那一天，称泰国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增长王国”，恐怕在世界上不会遭到多少反对。直到那天为止，泰国人民也怡然自得地享受着举世的赞美和“经济奇迹”的蜜果。

然而，那一天却也是泰国人民大厄运的开始。

地球的另一端，那一天索罗斯坐在他纽约的量子基金公司的办公室里沉思。

决定向泰铢下手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凭着他敏锐的预感，大胆的冒险，和心

狠手辣的果敢操作，索罗斯的金融投机事业越做越大。

对他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搞货币投机买卖，就象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厮杀一般，有着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的强烈刺激。

虽然在这期间也有败走麦城的惨痛失误，但大多数的冒险投机的结果，都使他公司和他个人帐户上的数额猛增。当然，也使他在世界上的名声越来越大。

现在，他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个人资产已达五十亿美元以上。金钱数字的增加对个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了。

索罗斯出巨资在很多东欧和独立的前苏联国家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资助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和现代化，还在美国设立“开放社会”基金，追逐暴利的强烈刺激，仍然对他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那一天，索罗斯正在琢磨着谁是下一个他要下手的目标。

事实上，他当时已隐约感觉到，这个目标就是危机四伏的泰国货币——铢(baht)。

“笃，笃，笃”，有人在敲他办公室的门。

推门进来的是索罗斯的一位主要助手。他递给索罗斯一份文件，然后掩门退出。

这是一份有关东南亚经济状况的最新研究报告。索罗斯很快地把它浏览了一遍。他把这份报告轻轻放在办公桌上，准备有空时仔细研读一番。然后仰靠在宽大的皮靠椅上，准备继续他的思考。忽然，他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猛然坐直身子，抓起那份报告，翻到有关泰国的经济问题的部分。读着，他的心跳加快了，脸上浮现出抑制不住的兴奋的微笑。

凭着他特有的敏锐直觉，他断定当时泰国货币铢的兑换价格

已经严重高估。当时铢的兑换率是由泰国政府硬性规定与美元的国际市场价格单一挂钩。美元升则泰铢升，美元降则泰铢降。当时美元坚挺，所以泰铢也被泰国政府升值。

但实际上由于泰国近几年外贸出口萎缩，外汇储备下降，巨额短期外债偿还期临近，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一触即发。索罗斯在前几个月已经对泰铢做过试探，他越来越坚信，以泰铢作为下手目标，买空卖空，冒险大投机一把，很可能又能一举赚进亿万美元。

“好，就这么办！”索罗斯霍地从靠椅里站起，右手在桌上一拍，“先向泰铢下手！”

下达指令：全面抛售泰铢泰股

索罗斯认为，泰国正处于一场经济大灾祸的前夜。由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便宜的工业产品大量涌进西欧和美国市场，泰国的外贸出口面临竞争，日益艰难。出口增长量逐渐由滞阻到下滑。外汇储备量较之天文数字的外债已显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却浑然不知，继续大笔使用借贷的外国资金发展房地产，大型水电站，以及其他大型长线工程。

索罗斯知道，一旦向泰国铢下手，泰国政府手上的那点外汇储备根本无法与他抗衡。他决定亲自飞赴曼谷，在发动总攻之前，做一次实地侦察，并就地指挥这场惨烈的战斗。

索罗斯飞到曼谷的消息虽然高度保密，但还是被那些鼻子象猎犬一样灵敏的国际金融大炒手们嗅出了踪迹。他们马上竖起了耳朵，瞪大了眼睛，紧张地注视着索罗斯下一步的行动。

过去二十年来的实践，已经使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索罗斯这家伙对金融市场的变化，有一种不同凡响的超前预见能力。国际金融大炒手们心里都明白，毫无疑问，索罗斯此次泰国之行，

必然会有大的动作。

正如他自己得意地对他的朋友所说，他永远努力走在市场转折的曲线之前。为了确切地掌握索罗斯的行动细节，有些大的国际投资公司还专门派人研究。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索罗斯一抵达曼谷，就直接驱车去他的投资公司在曼谷的分公司办公楼。他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即召集他的手下人员开会，布置了这次即将开展的大投机的战术措施。他还亲自给几位在当地的朋友通了电话，以漫不经心的姿态询问了一些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状况。

打完这些电话后，他心里的意念更明晰了。

从他在曼谷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他所定下的决策完全正确。现在要做的是毫不迟疑地开展向泰铢的总攻击。

他决定，明天，六月二十四日，开始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索罗斯几乎一夜失眠。开始时，他躺在床上反复思考明天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它们将会引起的后果，以及需要开展的后续应对措施。到后来，他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出现了泰国金融市场形势大乱的影象。他明白，这是他心中的预感在头脑中的下意识反映。

一想到他的投机行动将会给泰国经济带来的大动荡，他心中曾有过愧疚并放弃已定计划的闪念吗？但即或有，那也仅仅只是一闪念而已。在金融市场的投机赌博中击败强大的对手，并一举赚取亿万美元的强烈刺激，象汹涌的浪潮在他心中激荡，把那点道德顾虑的闪念淹没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清晨，索罗斯早早地来到他的曼谷投资公司办公室，仔细审阅助手们连夜为他准备好的全面出售泰铢股票，可转换证券，现钞，和现汇的有关文件。

确定一切无误以后，他拿起了电话，向他的曼谷公司经理下达

了立即实施既定计划的命令。

其时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许。

惊心动魄的泰铢大搏斗

那天上午十时半，曼谷股票交易所里，索罗斯公司所掌握的所有各种泰铢股票和可转换证券，全部上市出售。

这些股票和可转换证券正在走强之时，因而在市场上立刻成了抢手货，很快大笔成交，并使索罗斯公司转眼间就赚了千百万美元。

同时，索罗斯公司的所有泰铢现钞和现汇，也全部都拿到各家银行去兑换成美元。由于泰铢正值坚挺之时，索罗斯公司的银行帐户上立即为此增加了几百万美元的进帐。

正如前文所说，泰国经济当时正处在一个泡沫繁荣的顶峰。各种大型长线工程纷纷蜂拥上马，高消费之风在全国盛行，全世界的资金大量涌进这个发展前景看好的“增长王国”。

这一切都造成一种误导性的高期盼值，使泰国股票普遍走强，其市场价值节节上升。泰铢的兑换率也因紧盯美元市场价格而水涨船高，使泰铢的市场价值出现虚假的坚挺现象。

在这一背景下，索罗斯的泰铢投机战略取得辉煌成功。

为了以假乱真，造成一种泰股进一步走强的迷惑阵势，掩护他的全部抛售泰股泰铢的战略计划，索罗斯还布置人故意在交易所抢购索罗斯公司出售的各种泰股。

在泰股本身正在走强，泰铢正显坚挺的情境中，这种抢购泰股的假戏，很容易地刺激了泰股市场期盼值的高涨。靠着这种超前的预见和高超的手段，索罗斯不但在几天之内就全部抛售完毕他手上的各种泰股，而且还大大地赚了一笔。

· 108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等到索罗斯全部抛售泰股泰铢的战略计划顺利实施完毕，泰股泰铢的市场价格开始下跌。实际上，这意味着索罗斯在泰国投下的巨额资金已全部撤走，并且以投机手段迅速地从这个国家摄取了亿万资财。

发现形势不妙，为了稳住泰国股票市场和泰铢价值，泰国政府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紧急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提出大量硬通货，主要是美元，投放市场。

但是，这个补救措施已经为时太晚，无力回天了。

那些早就盯住索罗斯行动的国际金融大炒手们，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过来。他们一边咒骂着索罗斯这个瞒天过海的老狐狸连他们这些金海老手都骗了，一边立即采取行动，大量抛售他们手上的泰股和泰铢。

一时间，排山倒海的泰股和泰铢抛售浪潮在泰国扩展，汹涌，激荡。形势急转直下，外国投资者的这股抛售浪潮又进而激起了泰国国内持股者的心理恐慌，促使他们也争先恐后地纷纷加入抛售大军。

曼谷股票市场很快陷入危机。各种股票市场价格每天直线下跌，带动了泰铢市场兑换价格的狂泻。在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泰国政府已经日见支绌，穷于应付。除了不断忍痛把日益减少的外汇掏出来，投放市场企图阻挡泰铢和股市崩溃以外，已经束手无策。

为了稳定军心，泰国总理差厄利六月三十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但是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泰国政府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七月二日，不到十天，泰国政府已经向市场投放了两百亿美元，但面对无法遏止的抛售狂潮，这两百亿美元只不过象两杯黄土扔进了怒涛澎湃的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时，泰铢兑换美元的价值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

国家外汇储备已经基本告罄，这一天，泰国政府无可奈何地向全世界宣布，放弃泰铢兑换率紧盯美元市场价格的政策，代之以让泰铢兑换率在市场上自由浮动。

这一下，泰铢价值犹如失控的潮水，不可止歇地向下奔泻。泰国的股票市场也开始全面崩溃。

震撼世界的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和祸水就此从曼谷肇端。

第十二章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月）

索罗斯和其他国际金融大炒手们联手彻底击溃了泰国的金融和股票市场，再次榨取泰国的财富。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涌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断地向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发动袭击，这些国家的金融防线无一例外地全面溃陷。

索罗斯在这次东南亚大投机中攫取了数以亿计的美国元。他也在这一地区结下了很深的怨恨，因为，“少数人从投机中得了利，可广大的无辜民众却受到极大的伤害”。

第二次袭击泰铢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紧盯美元的固定兑换率政策后，泰铢价值江河日下，泰股市价每天暴跌。泰国政府为经济动荡而心惊胆颤，商家大贾为财产的损失而痛心疾首，平民百姓为通货膨胀而叫苦不迭。

唯独索罗斯一其他国际金融大炒手们却为此兴奋不已。因为泰国的这种形势，为他们提供了再次赚钱的良机。索罗斯决定立即对泰铢实施第二次袭击。

前面谈到索罗斯在六月下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股。这些几百亿美元价值的泰铢泰股，实际上是索罗斯用他的财产信用为抵押，在泰国银行贷款所购买。在他趁泰铢泰股坚挺走强，并制造假象进一步抬高价格后，突然将手上所有的泰铢泰股都倒空，一举赚取几十亿美元。

现在，趁着泰铢价格跌落低谷，他决定采取两个步骤来开展他

的进一步向泰铢榨取财富的计划。

在索罗斯向泰国银行贷款泰铢的同时，他还向泰国的一些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发放了大笔的美元贷款。这位精明的投机家早就为他的投资安全留了后路，所有的美元贷款都是签的短期高息信贷协定。这些协定正好已纷纷到期。所以，索罗斯首先催逼那些借家还款。连本带息，他又赚了一大笔。

此时的美元，已绝非昔日可比。七月下旬，美元对泰铢的兑换价值，已几倍高于索罗斯一两年前向泰国银行贷款泰铢时的价值。这时，索罗斯仅仅只用他借贷泰铢时几分之一的价值，就轻而易举地全部偿还了他的债务。这实际上是索罗斯又一次狠狠地把泰国的财富刮了一层。

索罗斯对泰铢的第二次袭击，很快就又被其他国际大炒手们所摹仿。一时间，国际投资者蜂拥而上，纷纷向泰国的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索债。泰铢的暴跌，使私营公司的美元贷款变成了天文数码。很多公司大量举债，而且向好几个国际资本借贷，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实在无力还债，只好宣布破产。

这就给相当部分的外国投资者以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偿还债务压力，而国家外汇储备在徒劳的泰铢保卫战中已经几乎用尽，泰国政府的国际信用已陷入严重危机。其他国际投资者受此刺激，也争先恐后地撤资。

这一切都进一步地恶化了泰国的金融危机，形成泰铢爆发性狂跌的又一次浪潮。

泰国外交部长波拉楚阿布·谦亚桑(Prachuab Chaiyasarn)在事后接受加拿大马克琳杂志(Machlian's)的采访时，告诉记者，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对索罗斯一类的金融投机家有着很深的怨恨。“少数人从投机中得了利，可广大的无辜民众却受到极大的伤害”，波拉楚阿布先生沉痛地说。

祸及东南亚三小虎

泰国货币的狂跌和股市的崩溃，立即强烈地波及到其他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另三个因快速发展，而与泰国一起被称为“东南亚四小虎”的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一九九七年七月下旬，马来西亚货币元(Ringgit)对美元的比价已贬值百分之二十五；菲律宾货币比索(Peso)已贬值百分之二十七；印度尼西亚货币盾(Rupiah)则已贬值百分之二十八。

索罗斯打垮泰铢后，立即把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马来西亚元。索罗斯认为，马元当时有着与泰铢同样的问题。

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也是采用紧盯美元的固定兑换率，所以在七月以前，马元随美元价格上扬而升值。索罗斯断定，马元价值当时已严重高估。

马来西亚其时债台高筑，且多为短期高息债务，偿偿高峰期已经来临。但政府和私人大公司却未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依然继续向国际资本借债，转而向国内长线工程大笔投资，对外汇储备短缺，缺乏偿债能力的严重问题浑然不觉。根据索罗斯的评估，马元已经处于潜在危机的重重包围之中，剧烈贬值的灾祸一触即发，此时正是对其袭击、牟取暴利的良机。

从七月中旬开始向马元下手，他运用在泰国已施展过的同样策略，又一次取得辉煌成功。买空卖空，声东击西，索债抽资，索罗斯在马来西亚金融市场上忙得不亦乐乎，满载而归。短短一个月中，他又从马来西亚大投机中，赚得了千百万美元。

当然，他的投机大胜利，也同样触发了马来西亚股市的大崩溃和马元的大贬值。到八月中旬，距索罗斯开始袭击马元仅仅一个月，马来西亚的整个经济就如同中了神话故事中的魔法一样，不可

思议地突然由欣欣向荣陷入了极度萧条。

倒闭，失业，贫困，动乱……很快就像瘟疫一样向全国蔓延。马来西亚成了继泰国之后的又一个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其他国际金融大炒家们也紧跟索罗斯，在马来西亚市场上大玩投机游戏，形成一支国际金融袭击队，狠狠地榨取和劫掠马来西亚的财富。

当索罗斯在七月中旬发动对马元的袭击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正好在国外度假。等到他匆忙从国外返回首都吉隆坡，他发现他的国家已经突然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使他感到极度惶惑和震怒。

他立即认定这都是索罗斯及其他国际大投机家制造的祸端。他一面在国际上公开谴责索罗斯的恶毒行为，一面采取补救措施，包括限制金融投机，用国家储备向市场提供美元，企图挽回危局。

但是在国际大财团的轮番打击下，马来西亚的有限外汇根本无济于事。马哈蒂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在狂乱的金融危机中，而他自己则无力回天。

在打败马来西亚的金融防卫后，国际金融袭击队就象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胜利之师，马不停蹄又在索罗斯的带动下，杀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因为在金融体制和政府管理上存在着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相似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防线很快也被这支强大的国际金融袭击队分别击溃。

这两个国家因而也相继在八月和九月陷入股市大崩溃和货币大狂贬的危机。紧接着而来的，当然是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甚至还引发了潜在的政治危机，形势十分可忧。

索罗斯主导的这次东南亚国际金融投机大战，在东南亚“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所触发的深重经济危机，迄今为止（一九九八年二月），还没有稍微消退的迹象。在笔者

起来,这次世纪金融大危机恐怕还要延续半年的时间才能开始实质性的恢复。

索罗斯到底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大投机中赚了多少钱呢?

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恐怕只有他本人才能提供。根据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共和报”(Republika)宣称,索罗斯这次从东南亚各工榨取的钱财“总在一千亿美元之谱”,但这个数字或许因为印尼人恨透了索罗斯而被放大。香港一份杂志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数字说:量子基金公司的盈利由六月底的百分之十四急增到七月底的百分之二七点一,这一个月就由总值一百五十亿美元猛长到一百七十亿美元。

围台打港 意在中國

九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上,最受注目的有两位明星,一位就是本书主人公索罗斯,另一位是有中国大陆“经济炒皇”之称、将于次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他们两人到会,实际上就是香港股汇市大战的起点。虽然两人彬彬有礼,含笑握手,实则心照不宣,各自调兵遣将,透出一股十月会战前的诡异气氛。

朱镕基在港时,与特区政府首脑董建华、香港主管财政金融的官员分析了形势,认为索罗斯来者不善,他狙击的目标会由非主流货币蔓延到主流货币,用声东击西的手法抛售股票,套买美元,强力迫使港元脱离美元的联系汇率,以打击港元。朱镕基还召集中资银行和中资公司,分析了严峻形势,部署不得再炒股,严阵以待。

而索罗斯一面在会上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反唇相讥,一

· 11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面频密拜会了磨根·斯坦利等证券公司与西方大银行的总裁、主管，策划了进攻香港股汇市的方案和进行了融资准备。

索罗斯曾经两次攻打台币炒股，一次是一九九三年挟五千万美元“登台”，两年后又挟一亿美元卷土重来，均被台湾中央银行实行保卫战套牢，大败而归。但他吃了一蛰长一智，一九九七年十月挟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所获暴利的雄厚实力，经三次发动强大攻势，终于首次大所斩获：赢得股市下跌百分之十、汇市下跌百分之五的钜利。

台币贬值，先导致韩币和韩国股市大跌，并开始产生第二波骨牌效应，索罗斯等人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放空港股，套购美元汇出，十月二十日起对香港股市产生冲击。

中国国务院一见形势不妙，十月二十二日召开有关香港金融风暴的紧急会议，李鹏宣布三项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以朱镕基为首的中央金融货币领导小组；拨出一定外汇储备，应对香港和可能引发的国内股汇市风暴；自十月二十三日起，银行各类存款平均灭息一厘一，以配合国营企业改革。

据悉，李鹏在会上并抨击索罗斯是国际金融杀手，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打中国主意。以帮助中国改革开放为名，搞基金会，他究竟意欲何为，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鹏不放过机会，还含蓄地批评了曾同意索罗斯在中国设立基金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

中国刚宣布银行利率降低，港股应声重挫，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恒生指数猛跌一千两百一十一点，创下历来指数下跌最多的交易日记录。并冲击全球，造成本书一开始所写的纽约股市“黑色星期一”，连索罗斯自己也随之受累，亏损不赀。

港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消息急速传往中南海。二十三日夜，朱镕基接报，先同香港特区金融证券主管通了电话，港方表示

相当忧虑,但也表明决心坚守港元。朱又立即通知香港中资银行和公司负责人翌日回深圳,朱镕基则率同中央金融货币领导小组成员星夜乘机抵深,次日上午商讨紧急对策。

这天上午,香港股市开盘继续走低,跌破一万大关,朱镕基边看港市电视,边主持会议。有人提出动议,用香港外汇储备托市。朱容基立即严厉批评,认为这是香港特区的职权,中央政府无权干涉,他指出,这是比救香港股市更重要的“一国两制”能否取得世界信赖的大问题。

到会专家最后认为,港元从长远看是要调整,但目前一定要坚守,分析起来,恒生指数可能跌到八千点,但较正常的是恢复到一万点。朱容基最后当机立断,指示中银和中资公司在恒生指数九千点时买进蓝筹股、红筹股,打一场“万点攻防战”。同时中银配合港府坚守港元对美元的联络汇率。

这一策略实施后,战况虽有反复,但一星期刀光剑影的较量之后,恒生指数基本站住了。

有专家为索罗斯测算在这场战役中的输赢说,索罗斯在股市上大赚,但在港元抛空卖出方面大赔,与朱镕基算是战了个平手。

东亚受害国吞下苦酒

索罗斯挑起了这次突发性的金融危机风暴之强烈,竟然使好几个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成功发展的东亚国家,比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击倒。

为了挽救他们涉临崩溃的金融体系,这些国家只好伸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请求巨额美元贷款,以缓解严重的资金短缺。即使这个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为此而提出的条件十分

苛刻，为了救急，这些国家也只好接受，正可谓“机不择食”。

事实上，当一些东亚国家的领导人、实业界、学术界和传播界严厉批评索罗斯的贪婪金融投机活动，谴责他应为这次金融危机负责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站在索罗斯这一边的。

与索罗斯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这些东亚国家的金融体制本身有严重问题。作为向这些国家提供救援贷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就是他们必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列的条件大幅度改革本国的金融体制。而这些条件，与索罗斯的理念几乎如出一辙。

索罗斯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国际投机家的货币炒作，而是危机受害国本身的金融体制有结构性的问题。他列举这些问题主要是：

- 1、缺乏统一的建立在市场价值系统基础上的金融业监督机制；
- 2、金融市场被特权阶层垄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
- 3、中央银行缺乏独立的金融业务政策权力，政治和行政过度干扰金融营运；
- 4、金融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包含了滥用权力和倾向性决策的潜在危险；
- 5、金融市场对海外投资者限制过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这些国家开列的紧急贷款条件中，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几乎完全就是针对以上索罗斯列举的这些问题而提出。其中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业监督机制和机构；开放金融市场，取消特权垄断；赋予中央银行以独立的金融业务政策权力；金融决策过程和金融信息透明化；以及取消或放宽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对海外投资者的限制。

在这些国家相继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后，他们得到了这个与他们所怨恨的投机家索罗斯站在一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

一九九七年九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借给泰国一百七十亿美元。十月，该机构又提供了两百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贷款给印度尼西亚。十二月，这个组织再度宣布其三个月中的第三次紧急援救计划，即，立刻提供两百一十亿美元给南韩以解救其于金融危机的灭顶之灾，以后再分期提供这个国家三百六十亿美元，总共五百七十亿美元的救援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人之危还是急人所难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这些东亚国家的政府是不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援”贷款的。究其原因，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由美国作最大股东，由日本和几个主要西欧富国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一贯具有很强的支配意识。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以向南美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条件，强烈要求这些受援国家按照它所制定的纲领实施经济和政治的所谓“调整计划”(Adjustment Program)，因而在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股“调整”之风。

不幸的是，这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手操纵实施的所谓“调整计划”，在南美和非洲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相反，在理论上富丽堂皇的“调整计划”，在那些国家的实施过程中被弄得格外荒唐走板，使本来就问题多多、困难重重的政治经济形势，“调整”得更加一团糟。这点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南美和非洲普遍

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实。

从现实上来看，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有被西方列强或日本占为殖民地的痛苦经历。因而，二战后独立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大多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对西方列强或日本重新控制本国政治经济的危险特别敏感。

对东亚国家来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援”贷款，根据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坚持，就必需接受它提出的严苛的调整计划，这就意味着外国对本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和本国自主权的丧失。这对大多数东亚国家都是很难接受的。而这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居然接受了，无疑反证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局面是多么严峻。

这些国家接受附加条件严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救援”贷款，是“饮鸩止渴”或者注射一剂强心针？时下世人正在争论不休。从截至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情况似乎不妙。

汉城“东亚日报”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四日的一篇社论中忧虑地预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制下，南韩金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和市场的大幅度向外资开放，将会使南韩的金融业遭受更多的动荡，并更大幅度地受到国际资本的操控。

事实上，进入一九九八年后，甫刚接受巨额“紧急救援”贷款的南韩金融市场仍然未见起色。一月九日的晨市股票市场价值下跌百分之二点九，以四一一·七七收盘，比昨日下降一二·一九点。同一天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证券交易所指数下跌百分之一。马来西亚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百种股票综合指数下跌了百分之一点六九。菲律宾股市这天开盘后一小时就剧跌百分之十一，抵达五年来股市价值的最低点。

受邻国金融风暴影响，新加坡股市也发生大震荡，当天的海峡

时报工业指数猛烈下降百分之八点一。经济超强日本也未能幸免,东京当天股市开盘不到半小时日经指数就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三一。这股风暴还跨越太平洋,再次冲击纽约股市,使一月八日的道琼三十种工业股平均指数猛跌九九·六五点,收盘指数降至七八〇二·六二点。

第十三章

索罗斯自我辩护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九九八年元月）

索罗斯是一个多面体——索罗斯本人希望人们称他为“金融慈善哲学投机家”。

他不愧是哲学大师波普的门生，即使搞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依然振振有词：当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给勇于冒险而且头脑清楚的金融投机家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作为一个金融投机家，追逐利润是我的本份，我在东南亚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成功的金融投机家所应该做到的而已。对那些怪罪于我的人，我倒建议他们，如其迁怒于他人，不如反躬自问：为什么你们国家的金融体制这么弱不禁风？怎样改进才能使它健全起来以适应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律？

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空前大灾难骤然降临，很多权威人士对这一突发的巨变感到困惑不解。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自然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

比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八月份时就愤怒地指责索罗斯是造成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马哈蒂尔利用他作为替罪羊来掩盖自己在治国中的失败。

索罗斯还语带讽刺地说，马哈蒂尔“他自己才是他的国家的一个威胁”。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美国三大电视电讯网之一的 NBC 电视专访中，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泰德卡波问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你是造成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犯，你怎么回

应这一指责呢？”

索罗斯莞尔一笑，耸一耸肩，侃侃而谈。

他说，当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给勇于冒险而且头脑清楚的金融投机家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作为一个金融投机家，追逐利润是我的本份，这也是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所鼓励的。我在东南亚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成功的金融投机家所应该努力做到的而已。东南亚国家既然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以吸取世界资金为其经济发展所用，就应承认世界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并准备承担自由竞争的风险。对那些怪罪于我的人，我倒建议他们，如其迁怒于他人，不如反躬自问：为什么你们国家的金融体制这么弱不禁风？怎样改进才能使它健全起来以适应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律？

这倒是索罗斯一以贯之的看法：市场规律与道德良心是两个互不搭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在市场规律前讲道德是可笑的。

他也竭力强调另一个观点：当市场运作正常时，谁也改变不了既定局面。没有索罗斯，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会爆发。

也许索罗斯所说的不无道理，把这次“搅得周天寒彻”的东亚金融危机风暴的全面责任都套在索罗斯头上，正如索罗斯本人所辩解的，似乎有点偏头。

的确，经济学家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亚洲各国经济过热、汇率不合理、外汇储备过低等因素的总爆发。

就拿索罗斯对港币下手未能得逞为例，而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其港元汇率在这场危机中虽受冲击，仍岿然不动。连索罗斯也不得不慨叹：“任何人都不会因狙击港元而致富。”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背后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国的支持，中国和外港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高达两千亿美元。

据专家说，通常要想动摇一家中央银行的信心，至少要消耗它

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的储备。也就是说,要想打击港元,至少要调动五百亿至一千亿美元。问题是,如若谁能调动这么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其他地方赚大钱了,何必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背这么重的罪名!

索罗斯真能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但是话又说回来,索罗斯对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自鸣得意,毫无自省的态度,也是引起争议的。他高超而贪婪的投机活动对东亚乃至世界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剧烈冲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很多东亚国家货币与股票大贬值,进而使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比较公允的解释,恐怕还是本书开头所论析的,由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是促进世界货币流通量与国民生产总值脱节,使货币的币值在国际金融市场深受货币浮动兑换率的影响,这就给财力雄厚而又老奸巨猾的专业金融投机家创造了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控制或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以获取暴利,并造成金融和股票市场大动荡的机会。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上东亚很多国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脆弱经济体制,正好又碰上了索罗斯这样一个技艺超群、心狠手辣的金融大炒家趁机向东南亚市场下了车,遂导致了如今这样一场令全世界震惊,看似突发,实则其来有自的金融危机。

也许可以这样说,特定的历史条件,因缘际会地使索罗斯在这次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金融危机历史剧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情有独钟俄罗斯

索罗斯在东南亚掀起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风暴，并从中攫取巨额暴利，使千千万万的人陷入困境，当他正受到广泛批评和责难的时候，索罗斯却在这同一个地球上又制造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大新闻。

他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向俄罗斯捐赠一大笔钱。

如果认为索罗斯仅仅是一个特别善于赚钱的大投机家，那就低估他了。他还是一个常常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出尽风头的大捐款家。这使他赢得了——与他的职业金融投机家，似乎格格不入的闪光头衔——慈善家。

事实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索罗斯双重人格的体现。而且，这种人格的双重性在他的人生中被发展到极致，且相反相成，使他成为如今这样一位出人头地、不同凡响、极具争议、毁誉交加的世界级名人。

索罗斯常常有惊人之举。

就象他在金融市场上总是作出人意料之事一样，在捐钱的慈善事业上他也总是使世人大吃一惊。一九九七年十月，索罗斯对俄国进行了两周访问之后，宣布索罗斯基金在俄国的机构年预算提高两倍（从四千万美元提高到一亿三千万美元），今后三年内将分期捐出五亿美元给俄罗斯，集中“援助教育、卫生、文化和军转民人才的培训工作。”这个月他的量子基金赔本逾十亿美元，但开放社会基金会宣布对俄罗斯和其他各国的捐助援助计划不变。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索罗斯已经从他的私人帐户里炒钱投机而聚集的五十亿美元财富中，拿出总共十五亿美元捐赠给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事业。

自一九八七年以来,索罗斯基金会在苏联活动经过多次曲折,但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提供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而据另一个消息来源称,自一九九四年起,索罗斯已经向俄罗斯捐赠了两亿六千万美元。

这次宣布给俄罗斯的捐款,据称,将主要用于为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购买大量西方出版物,以及资助把学校和医院与国际信息网络连网的工程。这些项目都是俄罗斯政府官员多次乞求西方的资助而未获结果的难题。索罗斯还计划出钱资助对俄罗斯的商业管理人员,律师,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的项目。

索罗斯的这一宣布不但使举世惊叹,也使美国政府的外交人员既兴奋又尴尬。自苏联解体以后,索罗斯对俄罗斯的捐款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援助。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私下承认,索罗斯“已经做而且正在做我们政府应该做,但却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想象力去做的事”。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十三个已设有索罗斯基金旗下的慈善机构,在俄罗斯除了这个基金会之外还有两个组织:“国际科学基金会”和“索罗斯国际教育计划”。前者自一九九二年实行赞助进行基本学术研究的俄罗斯学者的三年计划,共捐出一亿四千万美元,给艰难度日的俄国科学家提供生活费,帮助俄罗斯减轻了人才外流;后者主要给中学与大学数学、物理、化学老师提供赞助。

至于文科教育,因为此一领域意识形态色彩曾最为浓厚,索罗斯掏钱出版新的教科书、培训师资与校长,已出版五百多种中学与大学新编教科书,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课程。

谁是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

然而，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索罗斯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的这一捐赠决定时，俄罗斯的叶尔钦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却保持沉默，没有表示任何感谢之意。

俄罗斯的新闻和传播界也似乎有意对这一捐赠保持低调，但却大量报导有关对索罗斯从俄罗斯的尤涅克西姆银行(Unexim Bank)席卷资金的传闻和责难。索罗斯的商业伙伴，尤涅克西姆银行行长弗拉德米尔·波坦宁(Vladimir Potanin)在俄罗斯也陷入了一场与其他实力人物的政治与经济的激烈争斗中。

对索罗斯为何情有独钟俄罗斯，俄国人早就众说纷纭。

一九九五年俄罗斯“独立报”刊出俄罗工情报单位写给政府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指出，索罗斯资金会在俄罗斯的活动涉嫌搜集高科技情报资料，破坏国家安全。当年俄罗斯国会就此问题举行了特别听证会，但与会者实际上漂白索罗斯的名誉，事后国会甚至通过决议对索罗斯表示感谢。

索罗斯一直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结果保持批判态度，认为俄罗斯经改产生了“掠夺性资本主义”(robbercapitalizm)，他强调，“在今日俄国用合法手段发财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九九七年年年初，与索罗斯私人友谊关系很不错的改革少壮派丘巴斯与聂姆佐夫上台之后，索罗斯对索罗斯的信心大培，决定增加对俄罗斯的援助。

索罗斯曾矢言不在开放社会基金会活动的国家投资，以免慈善动机落入话柄。但如今索罗斯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市场大量投资，据传量子基金也将进场在俄罗斯正式设立公司，不过索罗斯倒是一如惯例，在金融市场上搅风搅雨的左手，和在慈善事业上掏钱掏物的右手，绝不掺和在一起，他在俄国的慈善活动与其商业活动

各自独立，完全分开。

据美国媒体报导，事实上，索罗斯在俄罗斯有超过二十五亿美元的商业投资。他在俄罗斯的商业伙伴都是一些以前的政府高官。在俄罗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前高官利用他们手头的政治资源，与国际资本结合起来，用远低于市场价值的资金，买进大型国有企业，从中攫取暴利。

比如，索罗斯拥有百分之二十五股份的原国营企业夏甄维斯特通讯电讯公事(Syazinves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就是与一位前财政部长合资经营的。由于有人指控他们利用不正当手段低价购买这间企业，俄罗斯司法机关正在就此案进行刑事调查。

索罗斯曾公开宣称，他希望俄罗斯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守法资本家”，不要成为“强盗资本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索罗斯合伙在俄罗斯做生意的那些人，却都是一些“强盗资本家”。

索罗斯这么聪明的人，对俄国人的责难早就心知肚明。他许诺说，他将把比投资得来的利润更多的钱，投入他在俄罗斯的慈善事业上。

向韩国伸出援手

作为一个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与风作浪的巨大能量，并非偶然。

事实上，他以其多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连串惊世骇俗的冒险投机大手笔，赢得了无数金钱，也赢得了成功投机家的赫赫声名。

比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讲述的，一九九二年那个名扬四海的星期里，索罗斯在西欧市场上搞大笔金融投机，他看准了英镑即将贬值，马上借钱大量买进英镑，几天以后又全部倒卖出手，买进币

· 130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值较稳的德国马克，促成英镑狂跌，使他一下子赚取了十亿美元。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英格兰银行，被索罗斯打得趴倒在地，几乎全面破产。

索罗斯的投机游戏玩得越来越高超，这使得他这位专业投机家又在一九九七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大捞了一笔，再次出尽风头。不过他的此次胜利与上次一九九二年打败英镑事件不同。

那次的投机成功，不但使他在一夜间获取十亿美元的暴利，而且使他获得了敢于冒险，智慧超群，一个人打败财大气粗的百年老字号英格兰银行财团的赫赫英名。但这次的投机成功却使他的名声由独胆骑士变成了抢劫大盗。东亚金融危机受害国中不少政经界的头面人物都对索罗斯在这次空前大灾难中的表演十分恼怒，强烈批评他是掠夺东南亚财富的金融罪犯。

索罗斯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这种指责显得不屑一顾，并潇洒地为自己在东南亚市场投机行为的正当性作辩护，但他的内心实际上对改变自己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是十分在乎的。

一九九八年新年伊始，他就飞到汉城，向全世界显示他不仅仅在东亚赚过钱，也愿意在这个地区遭遇困难时伸出援手。

一月四日，索罗斯不顾旅途疲劳，一下飞机就要求会见南韩总统当选人金大钟和他的经济政策顾问。他首先与金大中的经济助理们开展了两个多小时的工作午餐，稍事休息，接着又与金大中本人共进晚餐，餐后再继续就解决南韩面临的严重金融困难长谈。

索罗斯明确地向金大中表示，他愿意尽力协助南韩克服这次金融危机。

由于南韩货币还在股市崩盘的影响下币值狂泻，连带冲击整个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外资因此纷纷抽离，大多数外国银行也拒绝向南韩提供新的贷款，这就使一向依赖外资的南韩经济遭到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南韩提供了五百七

十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贷款，但离解决南韩资金短缺的需求，还有巨大差距，所以外资依然观望，不愿轻举妄动。

索罗斯因此建议金大中首先要恢复国外资本和银行对南韩经济的信心。为达成此目的，他献计金大中南韩建立一间新的投资公司，负责处理由政府担保的债券转换和交易。索罗斯以一个国际投资者的身分告诉金大中，在南韩现实的形势下，只有政府担保的债券才能吸引外资重新投入南韩。他交保证，一旦南韩发行这种新债券，他将大笔投资。

南韩方面对索罗斯的这一姿态极表欢迎，因为这对于重建外国资本投资南韩的信心确实是大有助益的。一旦索罗斯大笔投资南韩，其他投资者将会跟进。

在别的外国投资者象躲避瘟疫似地逃离南韩时，索罗斯以他的这一出人意料之外的行动，为改变他在东亚的形象赢回了一分。

● 结语

索罗斯版本的“世界大同书”

(一九九八)

索罗斯提出：全球资本体制具有五大缺陷，必须以“全球开放社会”的药方来疗治。

“全球开放社会”既不是“世界国家”，又非“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是各国普遍承认社会现实的“不完美性”，以争取改进的态度构成的新社会。

“全球开放社会”必然承认市场的功能，不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观，凡主张互相尊重、言论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者均具体“入社”资格。

索罗斯的理念是什么？

无疑，索罗斯是金融投机界的天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天才。有句调侃的话说：无论何时他闯入世界金融的瓷器店，必有一些东西会被打碎。

而索罗斯自己，总认为有些很新的“哲学观点”想向人们表达出来。

他的这些观点，其实主要是卡尔·波普观点的回声，但索罗斯自己也不是毫无独特建树，他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天生有缺陷的，人们主观期盼与客观实际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有时候差异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有些时候，二者之间鸿沟之大，足以构成决定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全部历史，就是由人们的过失，偏见，错误概念构成的。

如要用一句话总括索罗斯的理念，那就是“我(索罗斯)相信的是我的谬误性，即我可能犯错这一点。”

他更认为这理念的重要性是等同“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儿的重要性一样。(吊诡的是，尽管他尝试努力但却不能证实这信念的真实性。)索罗斯受波普的思想影响，并把它应用于经济及政治的环境中。从认识自己有错误的可能性延伸推论到认为自己对事物理解欠完整，是索罗斯投资理论的中心思想。

他认为现实是浮动的。人的思想与现实有两种互动关系，它们分别是人的思想对现实的认知功能(人的思想能反映现实)及参与功能(人所作的决定是基于人对现实的诠释，而人的决定亦能改变现实)。这两种功能指向相反方向，却互相影响。这理论套用于金融市场上，便成为他著名的“大起大落”理论的主干。

这套“大起大落”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某一个趋势的形成期。当人察觉这种趋势时便会

加强它，流行趋势的现实与人对现实的诠释互相加强。如这趋势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将会变得更为巩固，这趋势便进入第二阶段：加速阶段。

当这种趋势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渐渐扩大，由于潮流的惯性，人们还是相信并追随这种趋势，但是人对这趋势的信念不会加强了，这便是第三阶段：黄昏期。

最后阶段便是当人对这种趋势的信念尽失，更产生一种逆反的偏见。这称为“更迭点”。过了这更迭点，相反的趋势加速运动，形成大崩溃。

这套“大起大落”理论确实把握住了事物发展的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它的局限在于有太多因素或过程能干扰趋势的进程，打断预期。不过索罗斯套用这理论在他的投资策略上，还是能解释一些市场现象。

他直言自己是挣下用不完的财富时，才成为一个慷慨的慈善家的。而他的慈善捐赠背后是有他一套理念的支撑。他的捐款宗旨是“支持冒着生命危险为自由和开放社会奋斗的人”。他的策略是在一些封闭社会设立基金会，目的是“打开封闭的社会，使开放社会更稳定，及培养批判的思考方式”。

在廿五个有他的基金会的国家中，他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匈牙利基金会。索罗斯曾用每年三百万美元的数额向当地文化及科学机关提供影印机等资讯传播设备。影印机数目越来越多，匈牙利的共产机器不能控制这些影印机，也就不能控制资讯的传播。

从一九八四年到八九年，他的基金会在匈牙利成为知识界的生活核心。纵使 he 自认不曾对东欧民主化进程施加很大的影响力，但他借着设立基金的参与，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疗治全球资本体制五大弊病的药方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号《大西洋月刊》上，索罗斯发表了以《迈向全球开放社会》(Towards a Global Open Society: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ors)为题的文章。

由于不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医生对他“扰乱亚洲金融市场”的点名指控，他便透过“布拉格发展项目联合会”提出这篇论文，针对亚洲金融风暴方与未艾的时局，阐述他对全球经济的见解，指出全球化资本体系有五大缺失，再次鼓吹他一贯提倡的“全球开放社会”，认为现在正是奠定这个“大同社会”基础的良机。

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获得西方各大报章的大篇幅报道与介绍，这一方面说明索罗斯所拥有的影响力，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论点引起相当共鸣。

索罗斯开宗明义指出，全球化经济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在利率、汇率和股市的走势上都产生密切的连带关系。全球化整合带来巨大利益，例如随着商品、资本和观念的国际流通，带给人们更多选择自由及思想解放。

但他也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绝非万应灵丹。主张市场力量高于一切的自由派经济理论声称，政府无须干预，自由市场本身就有“自我矫正”的机制。索罗斯对这种理论不能苟同，他认为，只有透过刻意和持续的努力，才能纠正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照索罗斯的归纳，全球资本体制的主要缺陷有五项，分别是：
一、利益分配不均。

资本的流通速度远快于劳力，金融资本的流通速度又优于工业资本，工厂一旦建成，就很难迁移，跨国企业在决定是否投资时，固然享有相当程度的弹性，但其弹性绝对比不上金融投资家。此

外,位在全球化经济的核心也优于位在边陲,上述因素促成资本往核心集中,也说明了为何金融市场的规模与重要性日益增加。

二、金融体系不稳定。

金融市场天生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通总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景气好时资本从核心流向边陲流回核心。

市场走势不一定反映市场的实质,而是反映投资人对市场的预期,但投资人往往是不理性的,因此更加深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之不能过于寄望于边缘地区的市场自我调节,因为金融冲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如何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索罗斯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金融市场就像是历史演化——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他指出,亚洲市场最近的金融风暴反映出许多问题,包括汇率的适当定位,银行监督不足及缺乏必要的金融资讯等。

三、全球垄断及市场求过于供渐渐成为威胁。

市场的不稳定不仅是金融体系,全球化经济体系导致资本高度集中和形成垄断与自由经济产生矛盾,必须以一定规范来约束。

四、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职能,使之角色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在维持经济稳定、确保机会平等及社会安全等方面,扮演日趋吃重的角色,但在全球化资本体制成型后,国家扮演上述角色的能力严重受损,因为在全球化资本体制下,资本比劳力容易逃税,对于税负高及保障就业的国家,资本避之不及,导致失业率上升。

国家在某些自有资本不足的国家还扮演另一种角色:政府与工商界合作,为工商界累积资本。日本、南韩和东南亚某些国家都是循这个模式走向繁荣。理论上,专制政府在国家繁荣之后有可能转型为民主,但证诸现实,这种转型谈何容易?专制执政者往往恋栈不去,同时以压制言论自由及放任贪污来维持统治。

五、价值与社会凝聚。

每个社会都需要共同价值来维系其存在，市场价值本身没有这种功能，社会需要一些建制来达成政治自由及社会正义等目标。这些建制存在于某些个别国家，但未为及到全球社会。全球社会的发展落后于全球化经济的成长，除非弥补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全球资本体制无法生存。

分析完全球资本体制的五大缺陷后，索罗斯又一次开出“全球开放社会”的药方，声称这既不是“世界国家”，又非“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是各国普遍承认现实社会“不完美性”，以争取改进的态度而构成的新社会。“全球开放社会”必然承认市场的功能，不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观，凡主张互相尊重、言论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者均具备“入社”资格。

除此之外，这个由一些自由民主社会建立起来的“全球联盟”（即全球社会），将能起着类似北约组织那样的维护安全、保障自由的作用，从而弥补当前“国家作用有限、国际机构无能为力”的缺陷。

有索罗斯看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无可逆转，对该趋势仍持犹豫态度者将会受到时代的惩罚，“全球社会”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固然是件棘手的事，但是不干预则后果更加危险。

“全球开放社会”与“亚洲价值观”

“全球开放社会”的概念远远未能被人普遍接受，这点索罗斯倒也有自知之明。尤其是与“亚洲价值观”尖锐对立，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前此坚持“亚洲价值观”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怒火万丈地抨击索罗斯说：“货币汇率如此暴泻，令东南亚地区的穷人雪上加霜。他们与索罗斯无冤无仇，为何要家破人亡。这个亿万富豪真是黑了心肝！”

他还指斥索罗斯阴谋阻挠“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这就使人很自然地想起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九九三年提出的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将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明提出挑战。余音在耳,就爆发出这场亚洲金融风暴,索罗斯几年来一直是“拆东亚补东欧”(一九九四年就有人以此为批评他的文章的标题),在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他主持的量子基金更起到了极大摧毁性作用。

尽管据传亨廷顿教授最近宣布放弃了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他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见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不会随风而逝,不由得人不对索罗斯这个犹太裔金融家的真实意图来个“对号入座”,怀疑他是对正在兴起的、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亚洲文明,先下手为强进行反制。

平心而论,索罗斯在亚洲金融市场到处游走投机,大开“杀戒”,固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一路产生破坏,但是将之说成是“文明的冲突”,却有“上网上线太高”之嫌。别忘了,索罗斯并不赞成以族裔划线,也别忘了他刚刚对属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主要国家英国来过致命一击!

对他来讲,其实,“开放”还是“封闭”这二者才是他划线的准绳。

索罗斯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回答了坚持“亚洲价值观”持有者对他的批评。他强调,多元化已是全球开放社会的特质之一,它足以包容亚洲或其他地区的不同价值,唯一前提则是这些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注与尊重,例如言论自由及公平受审等基本权利。开放社会不一定要采取西方的民主模式,它只是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架构,至于具体内容则有待添加,而且因时间地点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内容。

人和资本的双重个性

索罗斯这篇文章及其前后提出的看法，引起了广泛重视。

一般认为，他确实看到了目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许多根本结构问题，所主张建立一个全球开放社会也有某种真知灼见，然而他却无视投机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戕害，这说明索罗斯同时“具备人与资本的双重个性”：一方面想成为开明的改革家和慈善家，一方面又不顾他人死活地投机倒把。

索罗斯并不尝试在现实基础上提出改革建议，而是凭空设想一个摆脱国际机构、干预国家内政的“伊甸园”——“全球开放社会”。有人冷隽地说：“就这点而言，不由得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某种美国情绪在作祟。”

索罗斯在面对金融危机问题时，固然对受冲击者提出改进建议（譬如，反官商勾结、控制举债和融资），但是，他并不关心如何促进第三世界商品、服务与劳务的自由输出，不关心重视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高成长率与经济的长足发展。

他感兴趣的反倒是要让所有的人接受社会的不完美性，让所有的社会更加开明地放宽金融管制条例和加速国际资金的自由流通。就连这次到韩国去向总统当选人金大中表示要带头投资，除了显示对受难国的怜悯的施以援手，也使人隐隐看出他将他的理念推广至韩国的用心。

果真如此，索罗斯所设计的理想世界将更加提高金融资本的活力，也将更加强烈地对“边缘地区”造成冲击。

由此观之，索罗斯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投机商的自白，所谓的“全球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金融资本家所构思出来的理想世界。

●附录一

乔治·索罗斯年表

-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二日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
- 一九四七年 离开匈牙利,到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
- 一九五二年 获伦敦经济学院 B.S. 学位
- 一九五六年 前往美国
- 一九五六至五九年 受聘于纽约的梅耶公司,从事三角套汇贸易
- 一九五九至六三年 任纽约 Wertheim 公司市场分析员,为各大投资公司提供对欧洲货币市场的分析报告
- 一九六〇年九月 与安娜利斯·维茨沙克(Annaliese Witschak)结婚,育有三个子女
- 一九六一年 归化为美国公民
- 一九六三至七三年 担任纽约 Arnhold & S. Bleichroeder 公司副总裁
- 一九七三年 与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合作创办“索罗斯基金公司”,启动资金为一千二

· 142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 百万美元。后更名为“量子基金公司”
- 一九七九年 创办“开放社会基金会”
- 一九八〇年 获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和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 一九八一年 与罗杰斯分手,量子基金公司受创;与安娜利斯·维茨沙克分居
- 一九八三年六月 与安娜利斯·维茨沙克正式离婚
-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与苏珊·韦伯结婚,二人育有两个儿子
- 一九八四年 量子基金公司损失六亿美元
- “开放社会基金会”建立匈牙利基金会
- 一九八七年 在股票市场崩溃中损失八亿美元
- 与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合作,在北京成立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
- 这一基金会在六四事件后停止活动
- 出版《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
- “开放社会基金会”建立索罗斯基金会联盟
- “开放社会基金会”建立苏联基金会
- “开放社会基金会”建立波兰基金会
- 出版《开放苏维埃体系》(Open the Soviet System);
- 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创办中欧大学,提供经济学、政治科学、艺术史以及各社会科学的硕士以上学位项目,后来又在华沙创立中欧大学的分校

-
- | | |
|----------|--|
| 一九九一年 | 获布达佩斯经济学和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出版《给民主保险》(Underwriting Democracy) |
| 一九九二年 | 打败英镑,获利二十亿美元,成为“打垮英格蘭银行的人” |
| 一九九三年 | 成立布达佩斯基金会 |
| 一九九五年 | 出版《索罗斯论索罗斯》(Soros on Souos)
获波伦那大学“劳里·霍诺里斯·考萨奖” |
| 一九九七年六月底 | 投机套汇引起金融危机,从东南亚扩散到东亚,引起全球震荡 |
| 一九九七年十月 | 在全球股市狂泻中损失惨重,据其公司发言人称损失二十亿美元。
同月索罗斯在莫斯科宣布:
将向俄罗斯分期提供五亿美元捐款 |
| 一九九八年元月 | 在一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迈向全球开放社会》,提出解决资本主义五大弊病的药方;同月抵汉城,表示愿向韩国投资 |

● 附录二

亚洲经济复兴成了泡影？

美国《外交》双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一/十二月号上发表了史蒂文·拉德勒特(Steven Radelet)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长文《亚洲经济复兴的过去与未来》。

拉德勒特是哈佛国际研究所准会员，萨克斯是哈佛国际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国际贸易教授。由位作者从宏观角度，回顾了亚洲经济三十年来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描绘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历史图景及其基本原因，以及亚洲经济将继续崛起，成为全世界经济活动中心的前景。

他们认为，从十六世纪初开始，西方在世界经济里一直处于上升地位。西欧和大不列颠衍生出来的四个殖民地(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美国)一八二〇年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四，收入已经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一九五〇年收入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人口依然徘徊在百人发之十七左右。

亚洲人口这时占世界百分之六十六，却只有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九。但一九五〇年，现代史上一个伟大转变宣告开始。到一九九二年，亚洲在世界总收入之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这个大变动可能会继续下去。

奇迹还是泡沫？

在一些人眼中，亚洲迅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双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十二月号上发表文章说，亚洲“迅速增长”看来空空洞洞，亚洲可能显示出跟五、六十年代苏联经济迅速增长时期相似的弱点。

在一九九七年中，多个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突然发生严重的货币危机，似乎使这些怀疑获得了支持。连过去对亚洲倾心的资金经理也谴责亚洲体制的根本弱点，包括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和对银行监管不足。

一九九七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不是亚洲经济增长结束的迹象，而是会随同经济迅速增长而一再出现的金融局面不稳定的模式。

正如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迅速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这些亚洲经济体也可能在两三年内恢复迅速增长。从长远看，增长会继续下去，因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已经采纳了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生活的组织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跟全球经济一体化了。

“亚洲奇迹”内容就是：尽管总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存在着严重缺点，多个国家的政府从日本早年的经验和六十年代以来彼此的经验中得益，能创造有利于私人投资赚钱的经济环境——几乎总是跟重要的外国股东一起。它们多数是在比较弱的经济体制当中开创一个资本主义飞地（Capitalist Enclave），把它逐渐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亚洲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消除政府的弱点，尤其是

· 146 · 摧毁亚洲：索罗斯风暴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共占亚洲人口大约三分之二，贪污盛行，司法制度不强，地方政府往往无权也无钱。但即使面临法律、经济结构和政治的严重限制，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激发出能使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

二〇二五年，亚洲在世界收入里所占的比重可能多达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西方的比重则从现有的大约百分之四十五降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西方生活水平仍然会高得多，但亚洲人均收入多半会上升至美国水平三分之一，目前只有区区百分之十三。

货币危机

泰国证券市场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到九月下跌大约百分之五十，亚洲其他证券市场下跌大约百分之四十。东亚经济增长的泡沫是否破了？

货币风暴反映的多半是短期的金融界顾虑，而不是区域增长的长期危机。在九十年代，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把本国货币跟美元挂钩，哪怕这个地区的贸易不光是依赖美国，也依赖欧洲和亚洲市场。

一九九五年年中过后，东南亚货币汇率大幅度上升。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泰国铢兑三·五日元；到一九九七年五月货币危机前夕是四·六日元，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一。

东南亚出口商实际上把价格订得太高了，产品进不了欧洲和日本市场。它们也面临中国激烈竞争，汇率自然因此受到压力。

金融危机还有第二个方面。九十年代，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吸引了不少外国投资，但到九十年代中，越来越多外来资金看来投向

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

许多国家解除金融市场限制后,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向国外借美元,然后把这些资金在当地借给房地产发展商。当银行以当地货币放贷,它们就必然面临货币贬值风险,因为跟借来的美元相比,贷款的价值会下降。然而,甚至当国内的房地产贷款是以美元借出,银行也得承担风险,因为万一当地货币疲弱,国内的房地产发展商将没有能力偿还美元贷款。

因此,当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一九九六年走下坡,各国货币在九七年贬值,银行便受到双重致命打击,许多银行因此周转不灵。银行资金不足以及监管不严,使银行业危机加剧。

尽管如此,货币危机(适当处理的话)不致使人对这个地区通过出口取得增长的基本策略或中期增长前景产生怀疑。

克鲁格曼的批评

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批评是,主要基础是大量投资支出,而不是基于生产力提高。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奇迹”增长不可能永远以调整率继续下去,这是正确的;对于亚洲经济增长基础是否坚实可靠,他的看法却是错误的。

首先,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是生产力提高加上资本投资。其次,只要投资支出经受得住市场考验,也就是说投资收入率高于资本成本,以资本迅速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可以非常可取。

在这点上,东亚和前苏联对比再强烈不过了。苏联资本是通过官僚命令分配的,不是通过市场力量。苏联的投资收入率低,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迅速下降。东亚的投资收入率却不一样,一直

保持着高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只逐渐下降。

克鲁格曼批评的一个一般性论点是正确的。随着亚洲经济体的按工人平均计算的资本上升到西方经济体的水平，资本边际生产力可能下降。但这点实际上回答不了增长减慢的速度可能有多快。在一切平等的情况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上赶上美国（人均约二万七千美元），增长率会倾向于逐渐减慢。

收入水平等于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增长率目前大约比美国增长率高出百分之二·八。如果美国人均年增长率约是百分之二，人均收入七千美元的国家（像泰国）人均年增长率可能是百分之四·八。当收入差距缩小到约等于美国水平一半，增长率减到约百分之一·四，所以收入一万三千五百美元的国家人均年增长率预料接近百分之三·四。

由于资本储存增长以及人口改变，在整个亚洲，经济仍然有增长余地。收入高的东亚经济体今后三十年的增长，可能会比过去三十年来得慢。东南亚和中国收入比先进经济体低，增长率应能跟过去三十年大致相同，因为资本积累增加的影响会被政策继续改变和体制改善抵销。在这些国家里，人口老龄化在减慢增长速度方面的影响，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东亚的增长策略

亚洲经济体的成就是不寻常的。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五年，四头“经济之虎”人均收入增加了不止七倍，东南亚和中国则增长了大约四倍。众所周知，所有这些迅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有相似之处：出口增长迅速，谨慎的政府收支政策，储蓄率高，推行支持识字率上升和提高基本教育的政策，

避免损害农业,人口增长率降低。这些高增长的基本特点,在东亚起了作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却行不通。

落后的国家怎能赶上世界带头的国家?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类。第一类是“大推动”(big push)理论: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通过对基础设施、基本工业和研究与发展进行大规模实际投资,在几乎同一个时间里让所有支持要素准备就绪,同时也进行法律改革和体制改革。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迅速工业化的运动和中国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大跃进,是这个主张破坏性最大的表现。

第二类是“进口替代”或“保护新生工业”理论。这个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需要在保护下赢得喘息时机,才能赶上外国竞争者。这个历史悠久的理论取得了一些成功,失败的次数却多得多。保护新生工业往往变成保护衰老的工业;保护使企业懒惰,依靠国家救济,在采纳新工艺方面落在后头。保护新生工业在大市场里收效最大。在美、德、日以及近期巴西、中国和韩国的记录是一定程度的成功,在拉丁美洲、南亚、中欧和其他地方记录几乎都是失败。

第三个理论的最好例子是亚洲,日本经济学家赤松金日三十年代贴切地称之为“雁阵(flying geese)模式”。根据这个理论,各国追随刚走在自己前头一步的国家的模式,逐渐在技术发展中提升:随着日本进入技术更高的电子、运输等部门,韩国和台湾从日本手中继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领导地位。十年之后,韩国和台湾提升到电子和汽车部件部门,纺织品和服装工业转到印尼、泰国和越南。“雁阵模式”可说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

如果“大推动”的体制例子是重工业,“进口替代”的体制例子是受到保护主义支持的私人企业,“雁阵”就是“出口平台”:创立一

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经济特区，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各国有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得克萨斯仪器、国民半导体等公司很早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新工业领袖于是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

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香港在五十年代成功，台湾和韩国等香港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以一九六五年依样画葫芦，马来西亚在七十年代初也这样做。东南亚国家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

到七十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

一九八〇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认为东亚成功的关键是“进口替代”而不是促进出口是谬误的。韩国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台湾、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把促进出口策略和“进口替代”策略联合运用。

批评劳工密集出口的人认为，单靠加工出口区的生产，保证不了能踏上梯子的上一个横档。但所有东亚“出口平台”的“早期毕

业生”——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都能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工艺和先进技术，其典型方式是继续依靠跟更先进的跨国公司组马联营企业和战略联盟。

例如：宏基获得了美国牌子的许可证，才在电脑生产方面长出牙齿来；三星跟 IBM 和其他居于领先地位的电子公司对盟，才从装配芯片发展到居于生产六十四 K 随机存取记忆芯片的世界领先地位。

内 容 简 介

乔治·索罗斯是应运而起，在世界金融和股票市场上翻云覆雨并赚得了亿万资财的大炒家。

马来西亚总理曾愤怒谴责索罗斯是造成亚洲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索罗斯则希望人们称他为“金融慈善哲学投机家”。

索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当今金融市场的时代弄潮人抑或掠夺世界财富的旷世大奸贼？是关怀人类进步的慷慨慈善家抑或自私自利的卑劣阴谋者？

本书循不同的侧面，描绘和剖析了这位性格和作为异常复杂的“善恶两面神”，并由此透视亚洲金融风暴这场本世纪末最大的灾难。

ISBN 7-80599-516-0



9 787805 995168

ISBN 7-80599-516-0/I·160

定价：9.80 元